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Irregular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 《记忆》266期

## 方延曦专辑（一）

### 【专稿】

方延曦 古稀回望人生路

第一编 七十忆旧

第一卷 出身阴影笼罩下的学生时代

### 卷首语 打破沉默

第一章 关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回顾与再思考

第二章 1957年父亲被打成“右派份子”

第三章 父亲与老朋友北大校长陆平的不同遭际

第四章 1957年“反右”前也曾有过快乐的童年

第五章 《赫鲁晓夫回忆录》与我们

第六章 金发碧眼的高中女同学赵韞慧的传奇经历

第七章 1964年我竟“考”上了北师大中文系

### 【读者来信】

1. 王复兴：主编纠错
2. 任富田：261期的误植
3. 吴兴月：读樊能廷之文的几点感想
4. 越人谈戴立清的回忆录

### 【本刊声明】

## 【专稿】



## 作者简介

方延曦，祖籍安徽，1946年9月12日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48年迁入北平，196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因反对“四人帮”及其帮凶遭到长期迫害，被打成“反革命”。1979年平反后供职于中国共青团中央机关刊中国青年杂志社，历任编辑、副主编、主编、副总编辑。1992年辞去公职，致力于教育软件研发推广及学前教育机构创办。曾获多项专利及国家有关部门多种奖项。

## 古稀回望人生路

方延曦

### 第一编 七十忆旧

#### 卷首语：打破沉默

写，还是不写？这是一个问题。

为这个问题陷于纠结，时间已经很长了。

为什么要写？

一个人活了一辈子，总得给后人留下一点什么东西吧？何况他还经历过一个动荡的时代，个人的命运也曾充满坎坷。了解这一经历的同时代的熟人大多采取鼓励的态度：写吧，不写太可惜了。

为什么不写？

这种声音来自和自己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亲爱者，我们共同经历过那个时代，她的个人命运比你还要坎坷曲折，然而她说：在中国，有这种经历的人太多了，写出来有人看吗？

也许是她的神经超级坚强，作为劫后余生者，她早已扭转了人生的大方向，她不希望因为纠结于历史而让本已所剩不多的生命浪费得更多。

我非常理解并尊重她的选择，但对于往事我还是不能忘却，是的，不能。

于是，我作出了郑重的选择：趁着我还能够思考，趁着我的记忆力虽然严重衰退却没有完全丧失，我要以忠实的态度记录下那些用汗水、泪水、甚至是血水浸泡的往事。那些往事是我们“最真实的生存状态”。之所以这样做，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将来；不是为了故人，而是为了生者。正所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

基于以上的理由，我决定在60岁将临之时打破沉默。

2006.8

## 第一章 关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回顾与再思考<sup>1</sup>

共产主义，在我们那代人的心目中，曾经是一个无比崇高、神圣的字眼。几乎从我们记事起，这个概念就开始深深植根于我们的灵魂中。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一切文艺作品，从教科书到小说、电影，无一不贯穿着“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如果说教科书上所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尚嫌抽象的话，那电影中的形象就具体生动多了。在《上甘岭》等电影中，革命战士在激烈战斗的间隙中，往往聚在坑道里，满怀深情地憧憬共产主义的未来美景，每个人的脸上都充盈着无比幸福的神情。在我们幼小的心灵和懵懂的头脑中，很早便刻下了这样一个深刻的信念：为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理想社会而奋斗，这样的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稍大一些，上初中时开始接触苏联文学，也能看到一些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作品，两相对比，更加觉得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不好，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一定会代替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

<sup>1</sup> 这一章原本是方延曦《古稀回望人生路·七十忆旧》一书的第二章，现改为第一章。原来的第一章（一切都将逝去，只有歌声留下）。将独立成篇，另辑发表。特此说明——本刊编者。

我出生于1946年，正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年。这一年，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内战开打，仅仅三年之后，共产党即打败了拥有800万军队的国民党，夺取了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刚刚3岁，还不记事。又过了一年，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0月，毛泽东派出志愿军入朝参战，刚刚4岁的我开始记事。最早的记忆是大喇叭里广播的歌曲“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和“王大妈要和平，要呀么要和平……”还有什么“活报剧”：有人穿着奇怪的后边开叉的黑长衫，长大以后才知道那叫燕尾服，头上戴着高高的圆筒帽子，身上写着洋文，被一群端着枪穿着黄色军装的人赶得抱头鼠窜，狼狈不堪。这是跟着妈妈到她任教的苏州胡同小学时看到的。其实，一个才4岁的孩子懂什么？不过跟着看热闹而已，尽管如此，仍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特别是围观的众人呼喊的口号：“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杜鲁门！”“打倒李承晚！”……想想看，光阴已经走过了60多年，这个杜鲁门、李承晚仍然记忆犹新，这可能是我最早知道的外国人名了，还记得一首童谣：“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多么好笑！

再大一点儿，就记得那个“毕加索的和平鸽”了，我是1952年6岁不到上的小学，《毕加索的和平鸽》是我看的小人书，当时还不认字，是听大人说的，但那一笔画出的和平鸽的图案十分独特，因此对和平鸽与毕加索这个洋名印象都非常深刻。

1953年春天，此时我6岁半，刚上小学一年级，遇到一件记忆深刻的大事件——斯大林逝世。知道斯大林是苏联的领导人，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懂，但是看到大人们胳膊上佩戴黑纱，表情悲痛，还有不少人甚至痛哭流涕。

伴随着这段历史，记忆最深刻的是“苏联老大哥”这个称呼，若干年后，看到奥威尔的小说《1984》，里边有“老大哥”的称谓，感慨良多。还有当时广播中几乎天天听到的《莫斯科——北京》的歌声，节奏铿锵有力，旋律完全不同于中国音乐的风格。60多年过去，歌词大半忘了，可旋律依然唱得出来。还有一首歌，同样记忆犹新，那是杜那耶夫斯基作曲的苏联国歌：“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它有无数田野和森林，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能够这样自由呼吸。”当然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上高中后，读到屠格涅夫斯基的作

品：《在俄罗斯谁能快乐和自由》，那是抨击沙皇俄国专制主义的，可是比起后来取而代之的苏联，其专制程度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我所上的史家胡同小学，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59号。其校址据说是明末抗清名臣史可法的家祠，就是个有几进的陈旧四合院，条件挺简陋，冬天上课还要生煤炉子。这条胡同住过的名人有：华国锋、荣毅仁、王炳南、李天佑等，在这里的单位有中国妇女杂志社、武警招待所等。

60年过去后，我曾去寻访过旧地，可惜已经面目全非。在网上看到网友留言：“半个世纪前高低年级一起，是一所完全小学，就近入学而已，没有什么赞助费一说。”“名牌学校，进去也难，不仅靠钱，还有其他……”“好难进的学校哟，同学的孩子想交赞助费进去，楞是没成功。”这附近的学区房，房价已高达每平米10万元。

其实，我是转学到史家胡同小学的。我最初上的小学是观音寺小学，大概位置在后来建成的北京火车站北面。姥姥送我去上学时，总要经过一段城墙，隔着马路，能看到城墙上立着一些金属架子，后来知道那些东西是观天象的仪器，那个地叫古观象台。那时，我家已经从南河沿搬到了东裱褙胡同，多少号不记得了，一个小门楼，进门是一条甬道。我家住的房子据说是日式的，一层上边还有个平台，南窗外是一个东西走向的狭长小院，种着两棵已经长得很粗壮的紫藤，枝条弯弯曲曲一直爬到房顶平台上。这个小院是我平日玩耍的地方。记得我曾用泥巴捏了一些小飞机、小坦克，放到哪里呢？我就踩着藤枝往上爬，把这些不象样子的小物件放到平台上。搬家转学就是因此而起。我的姥姥生病时躺在床上，隔着窗玻璃看见我手托小物件，颤颤巍巍地顺着藤枝往上爬，担心我摔下来急得要命。为了我的安全，父母做出了一个决家：搬家！

搬家搬到了什么地方呢？东城区干面胡同35号，这里原来叫吉林会馆，是当年吉林士子们进京赶考时落脚之处。现在变成一个三进的大杂院儿，住有几十户人家，称得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操着各地方言，干着各种职业。我记得有教师、中医、律师；还有手艺人、洗衣女工、木匠，……等等。那个律师，后来赶上肃反被抓进了监牢，在那个年代

里，一听律师这个名儿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家住在第二进院子，一溜五间大北房，我家住中间那一间，也就20几平方米，用隔断隔成两间，里间是睡觉的地方。一大家子八、九口人，人均也就两平方米多一点，现在看来未免太拥挤了，可是当时整个社会住房状况就是那样，所以也没觉得有多么难受。

搬了家，上学怎么办？干面胡同北面紧临的一条胡同就是史家胡同，史家胡同小学在当年就已经很有名了，我是怎么进去的呢？原来我母亲有个叫唐贵琳的师大同学刚好在史小任教，我母亲为此求到唐。当时我6岁刚过，个子又小，唐看到我皱皱眉说：“孩子放在这儿，我先给你看着，不行，你再带回去。”就这样，我进了史家胡同小学，刚开始真是懵懵冬冬，看见老师能叫出“妈”来。没过多长时间，我就跟上了，而且学习不费劲，我就这样在史小上到了毕业，成绩一直很好，这一点连老师们都有印象。如何证明这个说法呢？我的弟弟只比我小一年五个月，但上学晚，我上四年级时，带他去史小报名上一年级。他有点贪玩，成绩不太好，在他要升六年级时，我在北京二中该上初三，他的班主任、曾经教过我的朱老师把我找去了，说：“你弟弟能不能升级，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在那个年代，留级是个挺大的事情，我怎么能眼看着弟弟要留级而不管呢？何况老师又这么拿我一个初中还没毕业的学生的意见当回事。我对朱老师说：“给他个机会吧，我想他会努力跟上的。”后来弟弟果然没有辜负这份期望，顺利考上了初中，初中毕业时，不知为什么，一心想当火车司机，报考了铁道学院附中并且被录取了。其实他根本不知道，铁道学院不培养火车司机。他上到高二，赶上文革，大学上不了了，1968年冬，他和大批老六届学生去了陕北插队，后来转到内蒙莫利达瓦旗，两个地方收入差距太大。10年以后，他病退回北京，在一所中学当了老师。

俗话说3岁看大，7岁看老，我觉得真是有道理。我从小脾气很倔，认死理，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黑就是黑，白就是白，黑白分明，一辈子都改不了。当时规定7岁上小学，我当时还刚6岁，一般学校不收。大人叮嘱我，老师问你几岁了，你一定要回答：7岁。可无论别人怎么问，我的回答总是：6岁。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曾为一个被年龄较大的学

生欺负的小同学打抱不平，全然不想自己也可能挨打。性格决定命运。信奉“行得端、坐得正”的我，成年以后，嫉恶如仇，眼里不揉沙子，所以文革才会遭难，但也正因为这样，最终还是逃出了劫难。

小学生活中留下印象最深的应该还是老师。我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班主任都是唐贵琳老师，她个子不高，说话很快，笑起来很爽朗，动作很麻利。这位唐老师是西城区人民代表，中年以后患了癌症，终生未婚。

还有一位印象深的应该是姓刘的历史老师，中等个儿，圆团脸，短头发，肤色较黑。上课之余，他竟带着我们寻访了府学胡同小学里文天祥被囚的院子和位于北京南城袁崇焕的墓，以及日坛公园里中共早期领导人马骏的墓。说起后两位历史人物，恐怕现在好多大学生都未必知道。我的印象深和这样的教学方式应该说分不开。

还有一个老师，对我影响很大，这就是史家胡同小学的少先队辅导员康文信。康辅导员只比我们大10岁，年轻，有朝气，会弹钢琴，会唱歌。电影《柳堡的故事》刚上映，校园里已经听到他在唱“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哎哟……。”

在康辅导员那里，我看到了《红旗飘飘》，看到了《长征回忆录》。还有两本书，书名和作者我至今还记得，一本书是《我跟父亲当红军》，作者吴华夺，建国后成了将军。另一本书是《悲壮的历程》，作者是程世才，写的是红军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全军覆没，只剩八百人由李先念等率领逃到苏联境内，后从西伯利亚辗转回到中国的事迹。

对我影响最大的书，应该是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和《革命烈士诗抄》等，还有那些已经记不住名字的电影，关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信念的树立跟这些红色书籍与电影的影响显然是分不开的。

在我脑海中是这样一串清晰的画面：施洋大律师在军阀的法庭上为工人辩护慷慨陈词，季米特洛夫在纳粹的法庭上痛斥国会纵火案的制造者，卡斯特罗在独裁者的法庭上自豪地说：“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共产党人的高大形像与动人风采从小就扎根在我心里。

上五年级时，赶上中法合拍电影《风筝》要挑选小演员，康辅导员把我和另一个男孩

子推荐去了。现场还有其他一些与我们差不多大小的孩子，但我们显然不如人家活泼外向，到了这种场合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作个旁观者，结果当然是落选了。拍放《风筝》的电影，当然要拍手的特写镜头，有一个小朋友伸出手来，6个指头，当场淘汰。

也是上五年级时，学校里举办了一个展览，主题是宣传伟大祖国的建设成就，我担任了一个部分的讲解员，其内容是中国的铁路建设。我要面对中国地图，把所有的铁路线给听众讲述一遍，这让我知道了许多陌生的地名，比如青海的格尔木，现在可能不少人知道它，可那时候没人知道。还有德令哈、冷湖、芒崖，……这些地名就是现在也未必有多少人知道。这样的活动使我受益很大，至今我还保留着爱看地图的习惯。文革受难时，我们不少同学毕业后都选择了去祖国的大西北，去青海。

我上高中时康老师因工作出色被评为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后来调到中国少儿出版社下属的《辅导员》杂志当编辑。康老师后来娶了一位军队高级干部的女儿，住在北三里屯26号楼，这座楼被称为“将军楼”，而这座楼北面不远的一座楼——南30号楼就是文革后中国青年杂志的办公楼，我平反后就在这里上班。你说这事有多巧！

文革刚开始时我去过康老师的家，当时抄家成风，我有几个笔记本写了些完全无关政治的东西怕被抄走，想在他家里存放一下，没想到被拒绝了。为此事我很长时间有想法，心想：又没有什么犯禁的东西，怕什么呢？后来我听说，康老师家庭出身好像也有问题，他当时自身难保，也属情有可原，我因此很长时间为自己对别人体谅不够而感到自责。

1958年夏天我小学毕业。这一年春天我们——不对，不仅是我们，应该说是全国人民——干了一件大事情，什么大事情？消灭麻雀。外地怎么干的不清楚，我们北京是这样，老百姓全体总动员，连我们这些孩子，都参加打麻雀。怎么打呢？那些办法你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大树小树上都拴上铃铛，人在树下抓着绳子拚命摇；大人、小孩都上房，拿上脸盆、锅盖等一切能发出响动的家伙拚命敲，……麻雀就像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飞到哪里都不敢落，只有不停地飞呀飞，最后实在飞不动了掉到地上，生生给累死了！当时我们小孩子觉得挺好玩儿，后来知道这不过是从上到下干的诸多蠢事当中的一件。

1958年9月，我考上了初中——北京市男二中。

北京二中，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内务部街15号，即段祺瑞政府内务部公署所在地。其前身为清朝左翼宗学，始建于公元1724年，即清雍正二年。升学率100%，每年超过90%的毕业生考入第一批重点大学。叫男二中，因为确实只有男学生。

上中学后，增加了政治课，主要内容是讲“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讲五种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结论是斩钉截铁、不容置疑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此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本来理论的东西是很难懂的，然而由于开始阅读西方十八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如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对资本主义的残酷有了文学形象的佐证。

在学校里，我们除了上正课，还要上另外一种课：“全民大炼钢铁”。此时，毛泽东已经提出了“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简要表述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时至今日，我仍然可以一字不差地背出这些字句。一个只有小学六年级的12岁少年，竟然也能自觉地参加到宣传总路线的时代大潮中。多年后，我从母亲口中得知这样一个故事，是她的姑姑、我的姑姥姥告诉她的：有一天，这个姑姑走在大街上，看见一大群人围在一起，挤进去一看，只见一个戴红领巾个头儿很小的男孩儿正在对围观的群众大声宣讲总路线。她对我母亲说：那个男孩儿就是你的儿子。

可能真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事隔多年提起此事仍然觉得不可思议，一是为这么小的孩子竟能如此勇敢、不怕场，二是为这么小的孩子也能被裹挟到政治大潮中。其实想想也不奇怪，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在那时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不仅有董存瑞、黄继光，还有刘文学。刘文学就是四川一个只有十来岁的小学生，据报道是因为勇斗偷人民公社东西的地主而牺牲的。刘文学是个少先队员，少先队员的脖子上是要戴红领巾的。红领巾的意义可是太宏大太崇高了，它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它代表了国旗的一角。按当时的规定，孩子7岁上小学，9岁可以加入少先队，其全称是：中国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我上三年级时已经9岁了，却没能加入少先队，原因不知道。我是在上了四年级以后被批

准加入少先队的，五年级时还曾当过中队委员，胳膊上戴一个豆腐干儿大小的白布块儿，上边有两道红杠，这是中队长或中队委的标志，小队长是一道红杠，大队长是三道红杠。平时称呼往往简化为某某是两道杠，某某是一道杠，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意思。胳膊上能戴红杠的孩子往往是班里学习成绩与品行都比较出众的，否则老师不会指派你，同学们也不会服你。在那个年代，“听话”是个非常突出的特征，人人思想都很简单，更不用说孩子了，组织(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少有不服从，更不用说反对了。对于学生来说，都很守规矩，打架、骂人那是大错，轻则找家长，重则记过；考试作弊或偷东西更是不得了，一经发现，往往会开除。

哪里像现在啊，没有做过弊的学生就不叫学生！整个社会，上上下下人人作假，学生考试作弊根本就不算什么事儿！就有这样的真实案例：有大学生考试作弊被发现，学校给予除名处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学生竟然能告到法院，而法院竟能判学校败诉！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么！在我看来，这就是整个社会的堕落，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我曾问过在大学里当过院长、教务长的同学，他们对此往往也表现得很无奈。据他们说，这种现象实在是太普遍了，校方处理时十分“谨慎”——其实就是睁一眼闭一眼，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世风如此，没有人愿意缠到这样的“罗罗纲”里去。中国古语有云：法不责众嘛！

话头好像是扯远了。

全党、全民高举三面红旗的结果怎么样呢？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忘不了随后接踵而至的就是全国大饥荒。

我们住在北京城里，很少到郊外去，更不用说北京之外的广大农村了。当时中国大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城市里的居民绝大多数根本不知道。那是因为传媒的落后，更是因为当局的封锁。即便如此，我们这些住在“皇城”里的首都居民很快也便尝到了挨饿的滋味：一个是粮食定量骤减，一个成年男人一般只有不到30斤的定量，要用粮票去买，粮票每月发一次。粮食中80%是粗粮，即玉米面儿，北京人管那叫“棒子面儿”，都是仓库里放了不知多少年的陈粮，吃的时候感觉辣蒿蒿的呛嗓子。剩下几斤是所谓“细粮”，即大米、

白面；大米是糙米，北京人叫“机米”，白面是看上去不太白的所谓“标准粉”，特别白的面粉叫“富强粉”，只有逢年过节才能按户口本每户供应那么一两斤。

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主食构成实在太符合时下倡导的“粗粮为主，细粮为辅”的最佳结构了。那么副食如何呢？一人一个月凭票供应半斤油、半斤肉。一个月30天，分摊到每一天能有多少？蔬菜呢，夏天尚好，品种较多有的选择，到冬天，只有土豆、萝卜、大白菜这么几种可吃了，本来细菜品种就少，到了冬天价格太贵，大多数人家根本买不起。

说起大白菜，那可真是有的可回忆，绝大部分北京人冬天吃菜全靠它。那时每年一到10月底、11月初，你就看吧，满大街的路边儿大白菜堆得像小山儿，家家户户都得派人出来排队买大白菜。只见男女老少个个穿着臃肿的棉衣，缩着脖子，抱着膀子，冒着凛冽的西北风，两脚来回倒换着等着轮到自已。好不容易排到了，一买就是几百斤。北京的冬天从10月下旬开始到来年3月末，长达4个多月，100多天那，平均每个家庭差不多都有七、八口人，没有几百斤菜怎么能熬到来年开春儿？买到了大白菜就是大人、小孩齐动员往家里搬大白菜，家家户户的屋檐下、墙角边都码放着一堆堆的大白菜，相映成趣的是，旁边往往还堆着一些黑乎乎的东西，那是煤球儿或蜂窝煤，生炉子用的。一黑一白，这就是那个时代有名的“煤球炉加大白菜”经济。

生活再困难，我们毕竟有幸生活在首都北京，虽说过来人也都有饿肚子的经历，但饿死人的事还没听说过，可是外地呢？改革开放后，尘封的历史的某些角落被打开，人们这才知道，竟有几千万人在和平年代被活活饿死！这样惨绝人寰的悲剧就发生在“高举三面红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喧嚣声中！

我的姥姥就是在1960年的冬天去世的，当然，生活在北京的她并不是饿死的，但因为半身不遂瘫痪在床上已四年的的她也是经常喊饿。死的那天晚上要吃棒子面窝头，后半夜要解大便因为便秘解不出来，导致脑溢血而去世。那年我刚上初三。

我是姥姥一手带大的，父母都上班，当时所谓的“双职工”，一个家庭里若没有老人实在不可想象。我这个姥姥没文化有旧思想，重男轻女，她偏疼我这个大孙子，对我上边

的姐姐不太喜欢，所以我母亲经常上班时还要带着我姐姐。姥姥对我确实偏爱，我的兄弟姐妹都上过幼儿园，只有我没上过，说是舍不得。每天早晨上学时，姥姥会悄悄塞给我一个五分硬币，这五块钱刚好可以买一个烧饼，一根油条。这个待遇好像只有我一个孩子有。夏天天气热，中午睡午觉时，姥姥就坐在一旁给我扇扇子，赶蚊虫。有一次玩儿疯了，天已黑要睡觉了才想起功课还没做，我没道理地埋怨姥姥。姥姥则陪着我做作业，还不紧不慢地对我说：手是好汉，眼睛是懒蛋。现在想，这道理是多么通俗而质朴。

姥姥是从东北农村出来的，才20出头年纪轻轻就守寡。原来说家里有点地，但我的姥爷刚结婚没两年就因为赶大车出事故而去世，算不算地主我不知道，也从未问过。姥爷本来不是车把式，但要去赶车，不料马惊了把他摔下车，又拦胸轧过去。他爬起来去追车，结果吐血而亡。人家说，要命的就是这个追车，如果不追还不一定死呢。

我母亲十几岁时就因“9.18事变”跟着东北流亡学生跑到北平，一直在北平念书，姥姥则一直跟着我母亲在北平寄人篱下。这些亲戚当中有一个舅老爷很有点来历，名字我始终没问过，但据说他曾是周恩来的同学，“9.18事变”时他在辽宁的新民县当县长，日本人来了，他死活不肯挂白旗，看来还是蛮有民族气节的。后来逃进关内，又当了河北省的民政厅长。解放前夕，同乡阎宝航——就是那个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中共高级特工——策动他起义，他竟不从，看来反共又挺顽固。结果，“肃反”时被关了进去。还好，关了几年又放了出来，看来还不算“罪大恶极”。我就是跟着姥姥坐三轮车去看过这位舅老爷，他看上去已经很老了，穿一袭黑灰色的长衫，手捧一只水烟袋，呼噜呼噜地吸。他住在离赵家楼很近的后椅子胡同，那里离北京站不远。

1962年我正在北大附中上寄宿高中，家里通知我，说这位舅老爷去世了，他留下了许多书要处理，让我去挑点有用的。亲戚朋友都知道我爱读书，所以才有这样的动议，但是我只象征性地拿了一两本线装书，为什么呢？一个是不好意思，一个是我当时刚上高一，什么都不懂，不知道什么书有价值。现在回头想想那些古书就那么处理了也真可惜。

到了60年代初，中苏交恶，中共连续发出著名的《九评》，批判所谓的“苏联现代修

正主义”。这时候知道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知道了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知道了“匈牙利事件”，然而这一切都离我们太遥远，没有也不可能有切身体会。其实，“匈牙利事件”发生于1956年，但由于当时传媒的落后及当局的强力封锁，何况那时的我还只是10来岁的三年级小学生，对这些政治上的大事件根本不懂，因此没留有任何印象。直到上了高中，还没有将苏联发生的事件与中国的现实联系起来，还天真地相信报刊、电台上所说的，苏联共产党“修”了，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这段时期的宣传品与文艺作品中充斥着这样的口号和说法：“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从吃穿住行等各个方面都有显著的反映，而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从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的“离经叛道”开始的，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不再讲了，从上到下关心的都是经济基础的发展。从虚妄的政治的天空坠落到真实的物质的大地，这的确称得上是中国社会的真正进步。应了那句哲语“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邓小平应该称得上老牌的共产党人吧？正是他在其晚年终于说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名言，简单而深刻，一语中的。

此时再来回顾曾经的“共产主义理想”，说“恍如隔世”绝不过分。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用鞭子赶着人们进入的绝不可能是天堂。如果理想本身是虚妄的，它就经不起生活的检验，它的最终被丢弃就是必然的，不值得为之惋惜。

我常常为自己的后知后觉感到惭愧：你怎么愚钝到人生快落幕的时候才看清楚、想明白这些道理？但同时我又为自己最终能不把愚昧带到另一个世界感到庆幸。我钦佩写出了那份著名《遗嘱》的普列汉诺夫，钦佩写出了《我的根本意见》的陈独秀，钦佩写出了《1984》的奥威尔，钦佩写出了《新阶级》的德热拉斯，钦佩写出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而在人生的终点说出了“我们所建成的社会与我们想建设的社会不一样”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他们都称得上是“先知先觉”的预言家。尽管跟这些大智慧者无法相比，但我还是想说，虽然付出的代价委实大了一些，但我终究还是活明白了——用自己坎坷而真诚的一生。

## 第二章 1957年父亲被打成“右派份子”

我与中国共青团应该是有一点缘份的。

严格说来，我这辈子连共青团员都没当过，“缘份”何来？但是命运阴差阳错，事实上后来我确实在共青团中央的直属单位工作过长达13年，这是我此生唯一的一份公职，且曾与几任共青团中央的第一书记，包括胡锦涛、宋德福、李克强等，是住在同一座团中央宿舍楼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居。

共青团员当过就是当过，没当过就是没当过，怎么还要加上“严格说来”？那是因为北师大上大学二年级时团支部大会虽然通过了我的入团申请，然而文化大革命的不期而至把当时的党团组织都冲掉了，此事就没了下文。既然“程序”上没有得到上级组织正式批准，我这个“团员”当然就不能算了。

对于生活在五、六十年代的青年人来说，积极要求加入“组织”是人生的基本目标。什么是“组织”？就是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这3个组织对应于一个中国人人生的3个时期：9岁至14岁是少先队，15岁至18岁是共青团，18岁以后是共产党，与小学、中学、大学差不多同步。这就是说在一个人刚刚开始懂事的时候起，你就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你应该成为一个社会组织的成员，你的一切言与行都要与组织的要求一致，你不可以随心所欲。特别是共产党员，加入的条件很严格，出身不好的更要经过长期的考验，加入时还有宣誓的仪式，要对着党旗举着拳头庄严宣誓。50年代有一本非常著名的自传体小说，作者叫吴运铎，题目是《把一切献给党》，听听，把“一切”献给党！

我上高中时是六十年代初，开始大讲“阶级路线”，出身越是不好的青年就越是要努力要求进步，积极靠拢组织。所谓“出身不好”，指的是出身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份子家庭，即“地、富、反、坏、右”，以及家庭中有“杀、关、管”（即被杀、被关押、被管制）份子的家庭。在那个“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里，

凡是这类子弟的日子都很不好过：升学、入党、参军、提干、出国……基本没门儿，在日益沉重的政治高压下还得不断地努力“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以各种形式表示与自己的“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写“思想汇报”，“向组织交心”是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很多人在“思想汇报”中往往要把自己的父母骂得狗血喷头、狗屎不如，好像非如此不足以表示自己脱胎换骨的决心。发展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不少虔诚而无知的年轻学生还要以种种伤害父母的所谓“大义灭亲”行动表示自己的革命性，留下了许多伤天害理、惨无人道的历史记录。例如小说《青春之歌》作者杨沫的亲生子马波，在他以“老鬼”为笔名撰写的文章中曾披露，文革开始时他还是个初中学生，他曾带着红卫兵到自己家里“造反”，他亲手用绳子把母亲捆绑起来，把家里的钱抢走。还有那个大名鼎鼎的薄熙来，作为臭名昭著的“红卫兵西纠”（全名“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北京市西城区纠察队”）的头头，为了表示革命，竟亲自动手，把其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踢断几根肋骨！据说，文革后，陈云在世时始终把薄看成“三种人”，不予重用。

我的家庭出身就是“右派”，我的父亲就是“右派份子”。

父亲是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斗争”时被打成“右派”的。

那年我11岁，正在上小学6年级，对此事我一无所知，父母亲没告诉我，告诉我也弄不明白“右派”意味着什么。事后回忆起来，当时的家庭关系确实有明显变化，最大的变化一个是父亲经常不回家了，后来才知道是被弄到乡下“劳动改造”去了；另一个是父母的关系紧张了，常常吵架，闹得我们这些未成年的孩子整天忧心忡忡，时时担心父母会离婚，我们会成为或者没爹、或者没妈的孩子，那时常听到关于后爹后妈虐待孩子的可怕故事，让我们的儿童、少年时代始终笼罩着浓重的阴影。

我是在1952年9月上的小学，离满6周岁还差10几天，那时候规定7岁上学，因此一般同学都比我大一岁。可能因为从小发育不良，我不仅岁数小，个子也小，说来好笑，小学毕业只有1.35米，初中毕业只有1.52米。高中是北大附中，男女合班，连大部份女同学都比我高，这种情况造成别人往往都把我当小孩子看。事实上我也真是开知较晚，小

学、初中都是糊里糊涂一路过来的，上了高中还是懵里懵懂，不知道要像其他同学那样积极要求进步，努力争取入团。我从小学习成绩不错，念书不费劲，特别爱看课外书。团支部搞什么活动不找我，我也不闻不问，上课来，下课走，从来没想到主动靠拢组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高中二年级下学期。一天，我的班主任、教数学的女老师饶毅突然找我谈话，态度很严肃，一本正经地要我回家了解一下我的“家庭情况”。这让我觉得非常奇怪：什么叫“家庭情况”？可见当时的我离政治有多么远，好像不是在中国生活的人。

这时已经是1962年接近年尾的时候。周末晚上回家鼓足勇气问起父亲，25瓦灯泡昏暗惨淡的灯光下，他也严肃地一本正经地告诉了我他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现在已经“摘了帽子”。至于为什么被打成“右派”，据父亲说，他当时参加了“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简称）”，我知道“民革”是所谓“民主党派”，1949年前因为反蒋从国民党里分裂出来，成了中共的主要统战对象。1957年上半年中共号召民主党派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开始时父亲一直没说话，可是经不起领导一次次大会小会动员，到后来好像不给党提意见就是对党的态度有问题了，于是父亲也在一次座谈会上发了言，提了两条意见，一条是有些党员与群众之间有“墙”有“沟”，需要“拆墙填沟”；一条是“肃反”时确实存在“扩大化”问题，他以自己“肃反”时曾因同名同姓错误挨整为例。哪里想到，就是那么一次发言，一生的厄运就开始了。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紧接着发表文章《工人阶级说话了》，这时父亲才开始意识到事情不妙。这之后他见到了青年时代的的老朋友、出差回来的北京大学校长陆平。陆平听说父亲在座谈会上发了言，连呼“糟糕！糟糕！”其实反右前毛泽东已经给党内高层打过招呼，但不知什么原因，也许是没来得及，也许是以为父亲不会那么幼稚，总之陆平没给父亲通过气。尽管大家都很懊恼，但事已至此也无计挽回。

后来才明白，作为右派，就算给你摘了帽子，但你头上还有另一顶帽子，叫“摘帽右派”。与父亲谈话的这天晚上，我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等待我的究竟是什么。

### 第三章 父亲与老朋友北大校长陆平的不同遭际

说起父亲与陆平的关系，要追溯到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一二·九运动”是中共领导下在北平(当时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北京称北平——笔者注)掀起的一场学生运动，口号是反对国民党政府打内战，要求全民抗日。如“五四运动”一样，这次运动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带头。当时已是共产党员的陆平以北大学生身份作掩护做地下工作，穷学生没有钱吃饭，经常跑到父亲家“蹭饭”。父亲当时在著名的“镜湖中学”读高中(据说金日成也在这个学校读过书)，与同是东北流亡学生的陆平等过从甚密。据父亲讲，陆平在北大名义上读教育系二年级，但很少去上课，他当时即感觉陆可能是共产党，但谁也不说破。在陆平等影响下，父亲也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经陆介绍，父亲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一二·九运动”中，父亲是以中学联络员身份参加的，运动过后，很多积极份子去了延安。据父亲说，陆平临走前曾来找过父亲，但父亲刚好出门未遇。我问父亲，如果当时你在家，你会去延安吗？出我意料，父亲竟断然回答：不会。我非常奇怪，父亲解释的理由是他是家中的独子。当时我内心的反应，一是不以为然：革命嘛，就得豁得出去，怎么还能考虑独子不独子的？一是感到遗憾，如果那时父亲去了延安，解放后不是也成“革命老干部”了吗？我就是没想到，假如当时尚未成家的父亲真的走了，哪里还会有我们？

父亲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妹妹中的一个在16岁时滑冰不慎摔了一跤，以后竟因此而不幸早夭。早先我们一直管父亲的姐姐叫大姑，管父亲的妹妹叫三姑，可是奇怪从来没见过二姑，后来才知道是这个原因。两个姑姑大学全读的是北师大国文系，后来一辈子都以中学语文教师为职业。三姑的一个女学生叫白晟高，后来当了北京女二中的教导主任，她就是我在北师大中文系时的老师许嘉璐的夫人，许老师后来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我大姑、三姑嫁的人，按共产党的标准可能都属于“坏人”之列。大姑夫从来没见过，

可能解放前就死了，三姐夫好像坐了多年的牢，文革后放了出来，见过一两次面，瘦得皮包骨头。为什么坐牢？父母也说不清，可能又是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即解放前担任过什么“伪职”，其实当时很多人都是出于生活所迫，极少是因为政治上“反共”。父母不说，我们也不问，没什么来往，距离太远、太陌生，更主要的是在那样的政治空气下，人人都本能地回避这类关系。

父亲是独生子，爷爷死得早，可能是在1928年，父亲当时还只有12岁，是奶奶独自一人把姐弟几个带大。爷爷其实只是个小小的县级官员，当官的地方在遥远的东北黑龙江的饶河，就是1969年中苏两国发生武装冲突的珍宝岛那一带。在说这段事情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至今清晰记得的是父亲的一句话：“这么一大家子人，要在北平这样的大城市里活下来，几个孩子还能上到大学毕业，可见你爷爷当官时刮了多少地皮！”对这句话我的感受是：父亲当年能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跟他对家庭的批判、跟他的这种觉悟显然分不开，他不可能是个“反革命”。事实上父亲的思想挺正统，尽管受了那么多苦和罪，从来没听到他埋怨过什么。因此虽然父亲被打成了“右派”，我在“思想汇报”中也表示要与父亲“划清界限”，但在我的心目中，从来没有真的把他当作什么“右派反革命”，也没有因此埋怨过他。从1962年这次谈话一直到他2001年因病去世，40年里我和父亲之间再没提过这件事。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也是有的，但都与这个“政治事件”无关。所以后来想，人家之所以长时间不让我入团，事实上我最终也没入了团，证明人家的确还是有眼光的，因为我确实就没跟“右派”父亲“划清”过界限。

我不跟父亲谈他被打成“右派”这件事，“改正”前是因为不想给他造成亲人要与他“划清界限”的精神压力；“改正”后是不想让他再回忆那些令人痛苦的往事，这样做固然是出于孝心，但是我再一想这样做未必那么正确，其实我应该与父亲认真地谈一谈，听他说说他的感受。作为底层一个普通的小“右派”，父亲当然不可能了解上层、特别是毛的意图；但作为一个当事人、一个身受其害者，他的经历也是历史的一部份，而历史是不应该遗忘与湮灭的。

“一二·九运动”那年父亲19岁，照中国的老礼儿，独子寡母之家，即便父亲愿意去延安，老母亲也不会放，也许就因为这个原因，父亲失去了去延安参加革命的机会。

据父亲说，后来他上了师大，毕业后和母亲结了婚，赶上日伪时期，工作难找，经常失业。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参加了接收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前身)的工作，这让他接触到大画家齐白石。齐艺术造诣极高，但为人比较吝啬，社会上有种种说法，如小点心都发了霉还能端出来招待客人，连擦毛笔的纸都要小心翼翼地收起来等，这一点父亲曾亲身有所领教。父亲还接触到一个日本反战画家，名叫矢崎千代二，以画粉笔画著称，粉笔画，应该是一个很罕见的画种。日本投降后，他不愿回日本，但在中国又没有亲人，贫病交加，父亲就接济他，给他送食物、送牛奶，为表示感谢，他送给父亲几幅亲手画的粉笔画，这些画在文革中没有被红卫兵抄走毁掉，得以保存至今，而我爷爷留下的古董则全被抄走下落不明。多少年后，电视台经常放《鉴宝》之类的节目，便勾起姐姐心中的伤痛，每每说起此事都气愤填膺，我则劝她：你得这样想，多少人把命都丢了，你能留下这条命就不错了！

为了一个工作机会，父母带着姐姐和我去了东北沈阳，但没干多久，辽沈战役打响，沈阳被围。围城前父母带我的姐姐和刚刚两岁的我和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弟弟全家乘飞机逃出沈阳到了北平。当时逃难的人很多，飞机票极其紧张，据父亲说，是我妈妈的一个舅舅给弄到的。

这个我应该叫舅老爷的人名叫魏鉴，当时才38岁，好像是国民党军统驻沈阳站少将站长，沈阳失守后，此人就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其实跟此人也没有密切关系，只因为有这档子事，上师大后在“忠诚老实运动”中，我经反复思想斗争后还是老实地交待了这个“社会关系”。现在电视荧屏上充斥着抗日神剧和谍战剧，其中少不了的角色是国民党军统局驻某地的站长，这时我往往会想起我的这个从未谋面的舅老爷来。

在北京我印象中我们搬过好几次家。刚回北平时住哪儿我肯定不记得，记事时是在南河沿南口住，那是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往南走没多远出街口就是御河桥，后来就不叫这个

名儿了。上小学前住在裱糊胡同，这里临近明清贡院，可是个了不得的地方。说“了不得”是因为这里住过的大名，其中有：《牡丹亭》作者汤显祖，保卫北京的明代大将于谦，近代京剧界名人齐如山，桥梁专家茅以升等。2002年，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谦祠”被北京日报给拆了，媒体群声鼎沸，该胡同因此变得人人皆知。

我上小学后家又搬到了东城区干面胡同，就在史家胡同南边并排紧挨着。而我们住的35号则是吉林会馆，建于公元1884年，即清光绪10年。系吉林省在京官员钦差大臣喜昌鉴于吉林试子居住困难，将自有房产捐给了吉林同乡会。

生活充满了戏剧性。父亲与陆平阔别13年之后，1949年1月解放军进了北平。忽一日有人来访，穿解放军军装，从草绿色军用吉普车上走下来，身后还跟着两个警卫员，原来是陆平回来了。故人相见，想必是又惊又喜，可是双方的身份已是大不相同：父亲失业在家，境况窘迫，陆平则已是共青团华北局书记，军政委级干部，后又被任命为国家铁道部副部长。

若干年后我才知道，陆平的弟弟也是早年即参加革命，就是曾任著名的“哈军工”（全名“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的刘居英。中共的老干部很少用原来的名字，也许是因为革命工作需要隐蔽，不得不改名换姓。陆平在“一二·九运动”时就不叫陆平，而是叫“卢荻”——所以在父亲口中我们听到的名字都是“卢荻”，而不是“陆平”。刘居英也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朝鲜战争中刘居英领导东北铁路系统，辅佐高岗为打赢朝鲜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1959年12月毛泽东发起批判北大校长马寅初的“人口论”，陆平就是这之前调到北大当校长的。

通过陆平的关系，父亲找到了工作，陆平给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周荣鑫写了封信，父亲被介绍到北京市房管局工作。当时房地产管理局完全是个新机构，没有任何现成的章法可循，一切规章制度都是父亲和其他几位同事摸索着建立起来的，所以后来北京房管系统里流传着“三武一方”的说法。“三武”指三个姓武的干部，其中一位叫武明章，为了给杂志社解决宿舍问题我去找过这位当时已年过七旬的老人，已然垂垂老矣，须发斑白，慈

祥可亲，笑咪咪地对我说：“新中国房管这一套东西，都是当年你父亲和我们几个一块搞起来的。”话语中充满自豪。我能想见这些老人为国家做贡献所付出的辛劳。

然而从1957年打成“右派”到1979年获得“改正”，从41岁到63岁，长达22年的时间里父亲失去的有多少！我们能记起的是，父母因心情不好而经常吵架，家庭气氛紧张，孩子们唯恐父母会离婚而整天惶惶然；我们不知道的是，父亲被弄到乡下去“劳改”受了多少苦，他自己从来不说，从母亲口中得知他被弄去养猪。他一个城里长大的知识份子哪里会养什么猪？猪得病死了，他就得挨批斗。

打成“右派”，父亲工资降了两级，从18级的每月87元降到20级的70元，当小学老师的母亲还比他高一级，多6元。一大家子八、九口人，本来就不宽裕，这样一来钱就更不够花。1958年“大跃进”以后没多久，“困难时期”接踵而至，当时官方统一口径是：“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加上“苏联修正主义逼债”造成的。

当时早已实行粮票制度，城里一个成年人一个月发30多斤粮票，此时减到28斤，说起来也不算太少，问题是没有副食和油，一个人一个月只有半斤肉、半斤油，人就总是觉得没吃饱。这还是首都北京的情况，外地和农村比北京就差得多了。连续好几年食品极度缺乏，即便有点钱也买不到吃的，加上物价飞涨，日子有多难过可想而知。因为长期吃不饱很多人得了一种过去从未见过的奇怪的病：人全身浮肿，皮色发青，用手摁下去一摁一个坑儿，半天起不来。父母也得了这个病，但一样要坚持上班。

母亲是从农村出来的，虽说是大户人家出身，但对田里的活计并不陌生。最困难的时候不少人自己想办法开荒地种东西，母亲效仿此法也开了一小片荒种上了老玉米。可是城里哪有地啊，得跑到城外去找。母亲跑到了什么地方？跑到了位于城西南离家很远的龙潭湖边上，当时那里还相当僻静。隔三差五母亲就带着弟弟妹妹去那里松土锄草。

我在1961年考高中，考上了位于北京西北郊海淀区的北大附中，离家太远需要住校，两个星期回趟家拿点生活费，所以只跟母亲去过一次那新开的一小片地，绿油油的老玉米已经长得一人高。秋天到该收获了，听母亲说，长大的老玉米都让人掰走了，白忙一场。

说起收入水平，我家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的不少同学月人均生活费不到10元。可能因为父母都是知识份子的原因，不像人家工农家庭会过日子，我们家的日子永远都是那么紧巴巴的，工资发下来上半个月就花完了，下半月一定得借钱，所以小时候我的印象除了父母吵架，就是父母为借钱发愁。

#### 第四章 1957年“反右”前也曾有过快乐的童年

童年生活也有快乐的记忆，不过回头想那都是1957年“反右”以前的事了。

父亲其实是个挺有艺术细胞的人，会唱京剧，会拉京胡。墙上挂着把京胡，高兴时父亲就取下来拉上一阵，唱上两嗓子。我们孩子不懂欣赏，只觉得吱吱嘎嘎不那么中听，以至于我始终也没被熏陶出对京剧的爱好。父亲还会画画儿，主要是水彩画。我还记得一个周日，父亲带我们全家到德胜门城楼附近的护城河边郊游。在河边草地上铺一块大桌布，摆上面包、香肠、鸡蛋之类食品，孩子们撒欢玩耍时，父亲就支上画架画德胜门城楼。

那时候爸爸妈妈还带我们去听过音乐会，没错，真的是音乐会，地点是在中山公园音乐堂，那是个有顶盖没围墙的大厅，还有一个地方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劳动剧场，是露天的。看的什么节目基本上忘光了，唯一留有印象的是一位女歌唱家演唱的一首少数民族歌曲《玛依拉》，第一次听说还有什么“花枪”女高音，后来才明白，那不是“枪”，而是“腔”。

父亲还有一个特长，他很会讲故事，经常吸引好多小朋友聚到我家来听。父亲讲故事很会渲染气氛，也很会制造悬念，所以总能紧紧抓住孩子们的注意力。至今我还记得他讲的一个苏联的反间谍故事，说美国为了刺探苏联一个军事基地的情报，给一只狗装上了一只假眼，这只假眼竟是一部微型照相机，狗在基地里跑来跑去就拍下了好多照片。院子里的小朋友围坐一圈听父亲讲故事的情景至今难忘，就连那个美国特务的名字我都记得，叫西德洛夫。

既然父亲被打成“右派”，那就是“阶级敌人”，当然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不仅他

本人，也要株连上家庭。好多年之后我知道全国一共打了 55 万“右派”，很多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但在当时，我还不理解父亲打成“右派”对于我意味着什么。渐渐地我日益沉重地感觉到了所谓“出身不好”的“政治包袱”的压力，从此你就成了类似于印度“贱民”的那种人，被压在社会底层，动辄得咎。如果你想躲得远一点儿，不参加那些五花八门的政治活动，那你就别想有消停日子过，什么“思想落后”，“不要求进步”，“不靠拢组织”……诸如此类的大帽子有得是；如果你想摆脱被动，那你就得时不时地向组织提交“思想汇报”，有事没事都得把自己往非无产阶级出身上联，深恶痛绝地臭骂自己的祖宗八代，以示和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真诚地认为自己的出身是一种“原罪”，真诚地要把自己改造成无产阶级的一份子。这种真诚在很多出身不好的年轻人身上都存在着，这主要不是因为年轻人无知，而是长期的思想教育确实产生了强大的效果。是啊，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那么坏，腐败的国民党政府那么坏，不都让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赶走了吗？伟大的革命事业对于年轻人来说仿佛具有天然的感召力，几乎所有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年轻人都痛恨自己的出身，都羡慕工农家庭出身，都无限向往着投身于革命的大熔炉，在严酷的阶级斗争考验中丢掉非无产阶级思想，让自己百炼成钢。

1959 年我在北京二中上初二，这一年中国体育界发生了一件大事，香港归国的年轻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在世界杯赛上为中国夺得了第一个冠军。一天听到消息说，容国团要到东城区少年体校来，我和几个同学放了学就往金鱼胡同旁边的基督教青年会跑，少年体校就设在那里。到了地方，我们嫌书包背着麻烦，把书包往墙边的柜子顶上一扔，就往场子里跑。这次我们见到了容国团，还见到了刚通过“健将级”的庄则栋等，他们为观众做了表演，观众们反应非常热烈，我们这些孩子当然更是兴奋，回家时竟全然忘了书包的事。

第二天早晨上学发现书包不见了，没办法，硬着头皮去学校，跟老师说书包丢了。头一堂课就是班主任贾老师的几何课，这是个性子绵软的男老师，说起话细声细气，他并没责备我，还给我找了一本旧书。体校那里我去找过，柜子上什么都没有。我就这么对付着

上了一个多月的课，突然体校那边来了通知，说书包找到了，原来是掉到柜子后边去了。

也许是这件事引发了我的兴趣，我竟然喜欢上了打乒乓球，而且考进了那所少年体校。到体校打球总得有个球拍吧，我忘了是怎么跟家长要到了一点钱，到百货大楼买了一副球拍，单面胶粒，比光板强点儿，应该是档次最差的那种了，花了一元八角钱。没想到，父亲发现了，竟然坚持要我把球拍退回去。这件事当然让我很难过，我想不通这是为什么？好像家里缺钱也缺不到这个份上。很多年后才明白，那不是钱的问题，那是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已经没有了那个心境。

后来是一个叫朱柏良的同学帮了我，他借给我一支很讲究的球拍，双面带海棉胶粒，而且是下边稍宽上边略窄一些，像一些日本运动员用的那种。

说起来也真有意思，若干年后朱柏良邀我们到他家做客，那是东四附近一条胡同里一个很气派的大四合院。说“东四”，除老北京人外，没人听得懂。什么叫“东四”？“东四”是“东四牌楼”的简称，当年这个地方有四座牌楼，建国后嫌妨碍交通都给拆除了。同理，“东单”就是“东单牌楼”。

朱柏良怎么会住在这里呢？原来他娶了蒙古达尔罕王爷的外孙女，这里是过去的王府。这座王府年久失修，已经显得有些破败，问朱：为什么不装修？答曰：没钱。问：为什么不卖掉？答曰：老人不让卖。这里说的老人就是他的岳父，解放前辅仁大学毕业，原来还可以算是我的学长，因为建国后院系调整，辅仁并入了北师大。院落尽管破旧，但气派还在，特别是屋子里的陈设可了不得，一水儿螺钿镶嵌的红木家具。据朱说，这些家具文革时都被抄家抄走了，文革后落实政策又还回来的，香港导演李瀚祥拍电影《垂帘听政》时用的道具还是从这里借的。也是听朱说，这所四合院旁边还有一所同样的四合院，原来也是王府的一部分，建国后成了开国元帅刘伯承的府邸。

说乒乓球说到了这里，也真是挺有意思的。

其实我打乒乓球仅仅是个爱好，不会有任何前途，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根本就不是搞体育的那块料，我小学毕业身高只有 1.35 米，现如今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有长这么高的

了；上了初中也没长多少，初中毕业也只有 1.52 米，你说我能打出个什么名堂？仅说是爱好也不全面，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起作用，那就是当时的教育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如教育部长蒋南翔提出这样的口号：“争取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具体到学校里，规定下午 4 点以后不许呆在教室里，都要到操场上去锻炼。现在想来，这样做的确是无比正确的；再看看现在，为了怕出事避免担责任，有的学校连体育课都不敢上，真让人不知说什么好。

那时还提出过“劳卫制”，全称应该是“劳动与卫国制度”，还分一、二、三级，大概是从前苏联学来的，没有认真实行，热闹一阵就过去了。

值得说说的是“军事体育五项”。我在北大附中上高中时，参加了这个活动。所谓“军事体育五项”包括射击、跳伞、无线电收发报、舢板，还有一项忘了。前述四项，除跳伞外我都参加了。射击用的是小口径运动步枪，我的成绩还不错。无线电收发报也练过抄报与发报，后来看到谍战戏时也不觉陌生。舢板是在颐和园昆明湖里练的，记得有一次下起了大雨，我们干脆跳到水里，这让我知道了湖水不深，也就是齐腰而已。那时我还不会游泳，想不到后来还有横渡长江的事。

体育锻炼肯定是有作用的，想想我原来是那么小的个子，力量小，肺活量也小，跑不快、跳不高、扔不远、举不动，……只有反应比较灵敏算是个优点。可到高中毕业时，我身高已达到 1.68 米，上大学后又长了两公分，达到 1.70 米，这让我勉强过了“二等残废”的杠杠，同时体育课各项成绩也达到了优良水平。因为投篮准，上大学时是班里篮球队的主力，还代表中文系参加系间足球赛，第一次与数学系比赛就赢了，唯一的进球就是我踢进去的。后来我又学会了滑冰、游泳，这些运动对我强健体魄肯定有很大的作用，帮助我战胜了日后的许多磨难。

在北京二中上初中，也有关于老师的一点趣事可说。数学老师名叫张士祥，山东人，大高个儿，酒糟鼻子，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讲课很认真，嘴边上经常挂着的是高斯、华罗庚等数学家的名字。对于贪玩儿而学习不认真的同学，张老师很不客气，常常叫他们站起来加以训斥。

另有一位语文老师叫韩少华，韩老师中等个子，胖瘦适中，皮肤白净，风度翩翩，用今天的话说，长得相当帅，但我感觉有一点“娘”。他讲课就像讲故事，绘声绘影，连说带表演，可能有同学喜欢这种讲课风格。这位韩老师后来成了著名散文作家。

说回到“出身”这个题目。

了解自己的家庭情况就要向老师汇报，可以庆幸的是，老师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歧视，日子照常过去，很快我们就迎来了高考。许多年之后，高中同学聚会，各自介绍自己高中毕业后四十多年的经历，我才知道好多同学并不清楚我的出身情况，对此我真是觉得意外：那就是说，老师并没有把这个情况在同学当中扩散。我确实应该感谢这位老师，在那种对家庭出身畸型重视的年代里能这样做实在是太难得了。后来我又想，幸亏我早毕业，假如我晚两年毕业会是个什么命运呢？这样想并不奇怪，因为就在两年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北大附中的一个女学生彭小蒙等率先在学校里成立了红卫兵，1966年的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其中就有彭小蒙，那天，宋彬彬等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当毛问及宋的名字，听宋说自己叫宋彬彬后，毛的回答是：“要武嘛！”此后，中学红卫兵残酷殴打老师及出身不好的同学的“红八月”就开始了，很多无辜的人被活活打死，而第一个被打死的就是宋彬彬所在的北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卞仲云。

## 第五章 《赫鲁晓夫回忆录》与我们

对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思想与生活影响最大的历史人物应该是马恩列斯毛，即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而在这五位导师中，又要首推毛泽东，他的影响之大，可以彻底改变成千上万人的一生，甚至夺去他们的生命。说到影响，还有一个人是不能不提的，这就是曾经被毛泽东恨之入骨的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

当我回顾自己生活过的60多年时，我会同时梳理自己的思想，也会读一些我认为有价值的书，《赫鲁晓夫回忆录》就是其中的一本。

提到赫鲁晓夫就不能不提到斯大林。斯大林出现在我的记忆里，最早是在1953年，那

时我正在上小学一年级。3月初还是早春天气，人们尚未换下冬装，棉衣袖子上却戴了黑纱。凡碰上的成年人无不神色悲戚，有的甚至痛哭失声。原来是斯大林逝世了。我那时候还不到7岁，不明白大人为什么如此痛苦，但知道苏联是“老大哥”，同我们中国一样是社会主义国家。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不知道。而斯大林正是“苏联老大哥”的领袖，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至于什么是“无产阶级”？我的理解就是穷人。

斯大林的逝世令全国都笼罩在悲哀的气氛中，这给小小年纪的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能够和这次全国同悲相比的只有1976年毛泽东的逝世，还有周恩来的逝世。由于官方的特别重视，毛的逝世在北京这样的首都和其他大一些的城市里，人们的反应可能显得更强烈一些。至于乡村和偏远的地方，人们的反应就淡漠得多。那时我正流亡在新疆，虽然是省会乌鲁木齐，除官方组织的追悼会外，人们并没有什么自发的悼念活动。我甚至听到了这么一个故事，据说是真事，是当时发生的一桩“反革命案件”。

故事是这样的：毛主席老人家去世了，人们都跑到文具店买纸做花圈。售货员是一个中年男人，售货时动作慢慢腾腾，令排队等待的人多有抱怨。有人忍不住出来指责售货员：你能不能快一点儿，我们都等了一个钟头了！没想到售货员慢慢悠悠地说话了：你着什么急？你才等了一个钟头，我已经等了快20年了！故事到此为止，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售货员的命运可想而知，一顶“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足以让此人掉脑袋。

随着年龄的增大，有关列宁、斯大林的文章、电影也看得多了起来。那个年代正是一切都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时代，人们看到一切与外国有关的信息大都与苏联有关，而且都是颂扬的，即便后来开始反修了，为了批判“野心家、阴谋家”赫鲁晓夫，列宁、斯大林的地位反而抬得更高。在我的少年、青年时代，列宁、斯大林的形象是非常高大的，他们为反对沙皇统治英勇斗争历经磨难终致胜利的事迹在我年轻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还记得，1959年我在北京二中上初中二年级时弄到了一张中苏友好协会的借书证。北京二中在内务部街东口，中苏友协在南河沿，每天下午放学以后多数时间我都要到那里

借书还书，来回好几里路我都是徒步往返乐此不疲。上高中以后，有关斯大林肃反和30年代审判的事情多少听到一些，但调子都是“多亏斯大林英明，在苏德战争前夕消灭了敌人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第五纵队’，否则卫国战争不可能取得胜利。”云云。真实的情况是严密封锁的，因此不要说我们这些远离政治的孩子，即便那些职位相当高的干部和学问相当大的知识分子也难以判明真相。

说回到赫鲁晓夫。斯大林去世后，苏共上层发生了一系列政治斗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被打成“反党集团”。什么是“反党集团”当然不懂，而那些外国人名虽然有点拗口，但因为新鲜，耳闻之后却留下了印象，只是年龄太小，不懂；又离自己太远，听过而已。直到1961年我上了高中之后，这些东西又突然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确切地说，应该是出现在全中国人民的生活中。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发起了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掀起了一场又一场“反修”风暴。还记得反修文章“九评”陆续发表时的盛况，仿佛全国都沉浸在斗争的狂热中。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对于政治连一知半解都谈不上，却也开始对此发生了兴趣，特别对那些犀利的批判文章津津乐道。应该说，正是“九评”这类文章开了文化革命中大批判文风的先河，当然，即便同样的武断和不讲道理，若论水平之高下后者还是远远不及的。

在这些批判文章背后始终有毛的影子，有些文章则是经毛亲笔修改过的，这些修改要么是理论上的概括，高屋建瓴，气势宏大；要么是在某处引用一两句古诗或古文，顿时让文章显得跳脱、峭拔，这正是毛高出那些秀才的地方。

1949年刚建国时苏联是“老大哥”，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一切都要向苏联学习，如果有人对苏联稍有不敬就可能倒霉，有些人被打成“右派”，其罪名就是“反苏”。而到了此时，苏联竟成了万恶的“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成了最凶恶的敌人，这么大的弯子是怎么转过来的？

对这个问题我们根本就没问过，为什么？这个时候在我们的头脑里，毛主席说什么都是对的，没有丝毫的怀疑。

事实上当时中共在国际共运中非常孤立，只与少数亚洲国家的共产党还有往来。为了争取其中一些党的支持，中共采取了各种手段。当年吴冷西是参与《九评》撰写的秀才之一，他在其题目为《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披露的一个情节尤其令人震惊：毛泽东及中共当时曾不惜血本拉拢越共，派邓小平带着《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3 年 3 月 30 日来信的复信》的草稿和提供 200 亿人民币经济援助的承诺赶赴越南，用巨额经济援助换取越共支持中共的立场。这 200 亿人民币相当于当年（1963 年）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财政收入的 60%。时值大跃进重创国力、几千万人饿死不久，全国老少面黄肌瘦、营养不良，毛竟置 6 亿国民的生计于不顾，倾国库欲“收买”越共，以壮大其与苏共“决战”之势。

与反修斗争如火如荼相对应的是，我们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官方的说法是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加上“苏联修正主义背信弃义逼债”。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吃饭——粮食不够。粮食从 1956 年就开始统购统销，所有的中国人都得靠粮票生活，每月粮食是定量的，一般人超不过 30 斤。按说 30 斤粮食不算少了，放在今天，绝对没人吃得了，可是如果油、糖、菜、肉等副食少得可怜所谓“油水不足”的话，粮食肯定就不够吃了。我生活在北京，长到 18 岁以前也没出过北京，不了解外地的情况，仅就北京而言，已经是很多人吃不饱饭，不少人得了浮肿病，我父母也得了，人看上去不瘦，还有点胖，但皮肤颜色不对，灰中带绿，所谓“面有菜色”，用手在腿上一按，肉就瘪下去一个坑儿，半天不起来，其实这就是营养不良。所以这里的“胖”字，正确的读音应为 pang，一声。

这还是在北京，当局会千方百计首先保证首都的供应。外地怎么样呢？上了大学之后我才知道，很多地方是饿死了人的。我有个同学李先华，安徽芜湖来的。芜湖什么地方啊？那是江南著名的粮仓啊！可守着粮仓生生饿死了很多人。我这个同学是贫农，可是不能当兵，问为什么？回答是家里有人饿死。当兵与有人饿死这两件事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按照政策，“杀关管”家庭是不准有人当兵的，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让这样的人掌握枪

杆子。所谓“杀关管”，指的是被杀头、被关押、被管制，凡这样的人头上有一个大帽子，统称为“地富反坏右”，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这些家庭中的人都要受到牵连，在当兵、升学、当官、结婚等所有世俗认为的好事上基本上都没有份儿。上边说到的那些衔头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出身”或“成分”不好。出身不好的人从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注定了要被歧视，就像印度的“贱民”。不错，这就是“血统论”。而就是这样落后反动的“血统论”在号称全世界最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度里被奉为圭臬竟然长达30年！

即便你出身贫农，是所谓的依靠阶级，跟上述人等毫无关系，但就因为家里有人饿死，也不能让你掌握枪杆子！

为什么会出现60年代初的全国大饥荒？我们在官方所有的出版物上所能得到的答案都是一个口径——所谓“自然灾害”与“苏修逼债”。尽管现在人们已经知道这根本不是事实，可时至今日很多公开的出版物在提到这段历史时仍然沿用这种说法，可见历史的惯性有多么强大！

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尽管更多的表现在经济领域，但意识形态领域多少总是有所松动，于是我们终于知道了一些历史真相，包括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真相：它是怎样造成的？它又造成了什么后果？真正的原因就是1958年的“三面红旗”和“大跃进”。其实彭德怀的遭遇中已经透露出真实的答案。文革中流传出不少所谓党内机密，其中有毛泽东一些未公开发表的文章，如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的《机关枪、迫击炮的由来及其他》等，加上大批判文章从相反角度泄露的信息，有头脑的人已经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彭德怀出身贫农，从小家境很苦，参加革命后地位很高了也没忘记农民。1959年回湖南家乡考察，发现“大跃进”“大炼钢铁”把农村搞得一塌糊涂。“彭大将军”——这个衔头正是毛泽东给的——要为民请命了！他在中共历史上极为有名的第一次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上了一封“万言书”，没料到竟惹得毛泽东雷霆震怒。于是彭大将军被罢了官，国防部长换了林彪来当。接着在党内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保卫三面红旗”的斗争，一大批党的干部

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于是本来已经很左的路线变得更左，实事求是的作风被彻底抛弃，无论党内党外已经没人敢于说真话。其实“大跃进”的问题是明摆着的，毛泽东本人也是看到了的，据说庐山会议的初衷也是要纠“左”的，但是，问题就出在这个“但是”上，老虎屁股是不能由别人来摸的。其实，与彭德怀看法相同的人很多，像张闻天、黄克诚，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等，只是在毛的淫威下缺少说真话的勇气，只有彭德怀等少数人敢于说出“皇帝没穿衣服”而已。

对于那场“反修”斗争的正误得失官方至今没有反思，我们知道的就是邓小平在与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5月那次历史性会见时说的那一句“当时我们双方都说了一些空话”就一句带过了，对待历史的这种态度其实是很成问题的。

我所看到而且认为比较有份量的反思文章是一位叫陈小平的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的研究员写的，他在《评吴冷西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文中这样写道：

毛讨厌斯大林，却对斯大林主义情有独钟；捍卫斯大林主义，其实就是捍卫毛坚持实行的“阶级斗争挂帅”和“无产阶级专政”。正因为如此，当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主义时，毛会如此地怒不可遏。这样就不难理解，毛为何要与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斗得你死我活。

“中苏翻脸”发生在大跃进全面摧毁了国民经济之后，全国百姓嗷嗷待粮，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可那时中共领导人真正热衷的却不是救国民于水火；相反，毛泽东、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花了大量时间去开会反复讨论几篇批判苏共的文章，逐词逐句反复推敲，甚至直接代替“秀才班子”干起了耍嘴皮子、摇笔杆子之类的工作。为什么舞文弄墨会成为政治局和中共领导人的“头等大事”呢？他们并不是故意不干正事，而是在舞文弄墨的背后有大图谋——为毛泽东争国际共运的“精神教父”地位。在中共高层看来，这比国计民生重要得多。

正是毛及其同事们当时坚持的斯大林主义教条把中国推进了死胡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文革”这场大灾难，而毛的国际共运精神领袖之梦也彻底破产了。毛死后，当年紧紧追随毛指挥反苏“反修”运动的邓小平不得不部份放弃了斯大林主义，改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些政策全盘否定了当年“反修”主张的正当性，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政策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这场论战导致中苏全面为敌，中国最后不得不上倾国力“备战反苏”的道路，给国民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由于反苏“反修”而在国际上陷入空前孤立，毛及中共为拉拢一些小国替中国捧场，大幅度扩大对外援助，使国民利益蒙受了巨大牺牲。1961年和1962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合计为13亿7千万元，连同前3年的对外援助支出，5年总计23亿6千万元；其中援助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部份为18亿7千万，援助亚洲、非洲民族主义国家的部份为5亿元。而这些小国后来多与中国翻脸相向，特别是中国勒紧国民的裤腰带为越南提供了巨额援助，最后两国关系却走到了发动战争的地步。这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后果证明，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毛及其同事们当年制定的这些外交政策有多少成功之处。唯一具有正面意义的是，为了钳制苏联中国不得不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说，毛留给邓小平的最大遗产就是联美反苏。这一决策虽然终于把中国从完全孤立的国际环境中解脱出来了，但同时也否定了毛泽东立意对抗美帝的初衷。

文化革命中有一件事对我思想影响最大，这件事对我的思想可以说产生了“颠覆性影响”，这件事就是我看到了非正式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一套8本，收录了建国后毛泽东未发表的大多数文章，有一部分在“四人帮”垮台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可以看到，如后来影响相当大的那篇大骂梁漱溟的文章就在其中。说老实话，我曾经很喜欢看毛泽东的文章，从小学到中学每学期的语文课本上都选有毛的文章和诗词，不必说全社会对毛的推崇了，以我们当时的学养对毛当然更是崇拜有加，许多人因此下功夫模仿

毛的文风与毛的字体。文化大革命开始，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没人知道毛泽东发动这场革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天真幼稚的青年学生常年接受的都是正统教育，听说有人要反对我们最英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顿时热血沸腾，义愤填膺，红卫兵运动就是这样兴起来的。我的父亲是“右派分子”，我其实是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的，但我也是要求进步的青年啊，我总不能自外于这么伟大的革命吧？于是为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为防止中国改变颜色，我也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中。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那八本《毛泽东思想万岁》，看到了毛泽东那篇著名的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里面说到：右派分子攻击我们是秦始皇，他们说错了，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看到此处，我的脑子里好像“轰”的一声炸开了：话竟然可以这样说！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竟然自比秦始皇？不但自比，还比秦始皇超过一百倍！在什么上超过了呢？在“坑儒”这件事上！而且其口吻是那样洋洋自得！说实话，我真是惊诧莫名。我们小学时学历史，那秦始皇可不是个正面人物啊！尽管我的父亲也被打成了右派，尽管我从来不曾发现过他有任何一点儿对党不满的言行，尽管从此以后我们原本平静的家庭生活全乱了套，尽管无论如何努力我也难以跨进共青团的门坎儿，……可我从来就没有过一丝一毫的怨言，无论组织如何不厌其烦地长期考察，我总是以无比虔诚的心态检讨自己身上所谓的“阶级烙印”。1959年西藏“平叛”以后拍了一部电影《农奴》，当中的主人公被称为“带罪字的奴隶”，就是说他一出生就是奴隶，而所谓“阶级烙印”不就等于古代的“黥刑”吗？不就是身上永远带了“罪”字吗？

就是从这一刻起，我就像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小说《牛虻》中的亚瑟一样，头脑中的偶像动摇了。然而在这之前，尽管耳闻目睹了那么多的残酷，我却还在那里反省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软弱性”！

文革初期，红卫兵打人成风，特别是中学生中的红卫兵，有很多就是共产党干部的子女，才十五、六岁的少男少女，一个个穿着黄军装，戴着红袖标，抡着带铜头的皮带抽打那些所谓的“牛鬼蛇神”，很多“出身”不好的人和很多有成就的艺术家因此而死于非命。还有一些抱有“士可杀不可辱”的刚烈之士则选择了自行了断，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有老舍、

傅雷等人。

说实话，尽管打人的事件在文革初期相当普遍，但我从来没有亲眼看到过直接打人的场面，哪怕我自己家被抄我都不在现场，因为我从文革一开始就没回过家，自始至终都在大学里参加运动。但是打死人的事肯定是相当多的，只是至今无人统计数字而已。我亲耳听到两次有关死人的说法，一次是1971年4月在北师大因反对康生、谢富治被集体抓到怀柔庙城北京卫戍区3师7团营房关押时，听看守我们的一位解放军排长说的，他所在的部队被派到北京“支左”，正赶上北京红卫兵所谓的“红八月”，亲眼看到被打死的人一卡车一卡车地往城外拉。

另一次已经是文革后了，听说北京郊区大兴的一个生产队里一次打死了几百人，死者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只有38天，他们的罪名就是“地主、富农”出身，也就是说他们本人并不是地主、富农，只是地富子女。为什么要打死他们？除了他们的出身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革命的理由，那就是“北京郊区是和平土改”，而“和平土改”正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第一个打倒的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大黑帮”彭真的罪名之一！

1966年9月5日，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简报说，到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从简报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打死上千人被当做红卫兵的“战果”受到赞扬。

一篇《50年前的那个滴血的八月》文章这样写道：

1966年6月1日晚，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从第二日起，北京的大学和中学停止了日常课程，用全部时间来“揭发”和“斗争”学校的领导干部及教师。先是用大罪名如“黑帮分子”、“三反分子”等对他们作“口诛笔伐”，紧接着开始使用脏话咒骂。到6月中下旬，很多学校里出现了殴打校长和教员的情况。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数十名教员和干部遭到游街、戴高帽子、撕破衣服、在脸上抹黑墨、罚跪和扭打等等。两天后，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做出批示要求制止

这种“乱斗”（不是说“不斗”），后来他被指责为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7月26日，江青在北京大学的万人集会上宣布6月18日事件是“革命事件”。自此，暴力殴打“阶级敌人”立即开始流行。

北京大学附中成为北京市最早对学校的领导干部和老师进行野蛮殴打的地方。副校长、化学老师刘美德（女）被剃了“阴阳头”（剪去半边头发），被强迫在操场上爬行。还有红卫兵把脏东西塞进她的嘴里。有一天她被拉上一张方桌跪下，一个红卫兵站在她身后，把一只脚踩在她背上，由一名记者照相以后，那个红卫兵把她从桌子上踢了下来。当时刘美德怀孕已经很明显，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死了。

这里说的北大附中，就是我高中所在的学校。我是1964年毕业的，如果晚毕业两年，我这个右派儿子的命运难以想象。

客观地说，可能是书读得多一些，在打人方面大学生的确要比中学生“文明”一些，但在斗人上也是花样百出。看着学校的党委书记、总支书记、校长、系主任，还有老教授、“反动学生”一个个被揪出来批斗，又看着一个个被斗的人以各种方式自杀身亡，我确实感受到了强烈的血腥气，但一开始我并没有怀疑这场所谓“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正当性。只是当我看到那些被斗者或头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脖子上用铁丝挂着大牌子被强迫游街，或弯腰低头，双手后背，被强迫“坐喷气式”，甚至被强迫跪在地上的时候，我实在感到于心不忍。是的，我知道他们都有反革命“罪状”，大字报上一条条写得明明白白，至于是否属实，我根本不可能知道。但是，我还得跟自己头脑中的“小资产阶级软弱性、动摇性”做斗争，因为这种软弱性、动摇性不正是伟大导师在《毛选》里严肃批判过的吗？我怎么能不抓住机会，在这火热的斗争中改造自己？后来批判所谓刘少奇推行的“反动血统论”，我也参加了本班出身工人、贫农的同学组织的红卫兵，我们同其他任何一个红卫兵组织一样，无一例外都以“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口号，但其实在我的内心中这个口号已经没有那么神圣与真诚了。

1971年“9·13事件”发生，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林彪出逃摔死之后，毛泽东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的神话彻底破灭，我则完全看清了文革与毛泽东的实质。当时的中共中央为了向全党全国人民解释此事，竟然在中央文件中披露了林彪儿子林立果制订的一份文件《571工程纪要》。老实说，主持其事的人这么干真的有点蠢，他们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证明林彪是多么凶恶想杀害毛主席，但其效果适得其反，有头脑的人因此都看明白了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此后尽管“四人帮”又折腾了5年才覆灭，但文化革命从此开始退潮，毛泽东经此打击也一蹶不振，身体日坏。

话题似乎扯远了，其实没有。我在说我的觉醒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政治上我的确称得上后知后觉，但我也有个优点：做人太认真，我一旦认准的东西殊难改变。当然，在眼下的中国，认真可是个大缺点，甚至是致命的缺点，这个话题容后再说。

《毛泽东思想万岁》里还有一篇重要文章，那就是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毛在这个讲话里向全党做自我批评，表示要对1958年以后工作中的失误承担责任，还向那些在“反右倾”中被错整的干部鞠躬道歉。后来有不少文章写到这一段，说毛当时如何自责，饮食本来就很简单的毛如何更加节制甚至拒绝吃肉云云。若干年后我看到了王树增写戊戌变法的《1901年》，书里写到，八国联军进逼北京，慈禧太后仓皇出逃至西安。这时，一向奢靡无度的慈禧也变得分外“简朴”了，比如：“在京城，她一个人每月的花费在4万两银子上，而现在，整个皇室所有的费用被她控制在了1万两以内。”慈禧要过生日了，“有人想为她请戏班子唱戏，她想都没想地开口就骂了一顿，并且宣布以后一切节日庆典、典礼筵宴统统取消。”还有更了不起的举措，那就是“与民同寒”：“关中冬季的严寒冻死了不少饥民。为减缓寒冷，慈禧和皇上的房间里都铺上了很薄的毡子，但已破旧不堪。有人提议更换，慈禧坚决不准。”如此等等。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有个传统，碰上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皇帝往往要下一道“罪己诏”以示承担责任，收拢民心。当年祸闯大了难以收拾之际慈禧太后也下过这么一道诏书，不过是以那个倒霉的皇帝光绪的名义下的。然而谁都明白，皇帝再如何罪己，再如何苛己，真正受苦受难的还是那些老百姓。

对于毛泽东来说，拒绝吃肉、内心自责等情节或许全都是真实的，但这又能给那些饿死的亡灵多大的安慰呢？他们不可能活转回来，留在他们家人心里的是永远的痛。

什么事情能让毛泽东这种个性异常强悍的人在权力如日中天之时做出“道歉”这种异乎寻常的举动？因为正是在毛泽东亲自主管中国经济的这几年里，出现了决策方面的重大失误，以至于饿死了很多人。毛泽东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其雄才大略主要表现在指导战争方面。正是因为他以正确的战略战术领导中共及其军队打败了实力上远远强于自身的国民党军队，最终取得了中国的政权，对于中共来说，毛确实是最大的功臣，因此，中共才把毛泽东举到了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问题出在取得政权以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认为自己是“文武全才”，“全能第一”，他始终对党内公认周恩来、陈云等人善于管理经济的看法不以为然。后来有回忆录说，毛曾经很不服气地说：“我就不信只有陈云能管好经济！”于是1955年中共南宁会议上毛批评主张“综合平衡”的周恩来的“反冒进”是“离右派只有50步远了”。批评之严厉，后来有周恩来的传记作者作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描写，说周为了写检讨如何如何痛苦。1957年反右派后毛干脆让周、陈靠边站，把经济大权也拿到了自己手中，于是有了在毛主持下提出的“大跃进”的宏伟计划，要在15年内实现“超英赶美”，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的535万吨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全民大炼钢铁”因此而一哄而起。

这场“全民夺钢”的群众运动我也赶上了。还记得1958年正是我刚上初中的一年，就在北京二中的校园里，老师们用砖头砌成一个个所谓的“小土炉”，把从小工厂里搜罗来的废铁屑等下脚料扔到里面，下面点上火拉着风箱烧，有人手持大铁钳把烧红的料夹出来放在铁砧上，有人抡起大锤用力锻打。据说这就是钢，待冷却后一看其实不过是个灰黑色的铁砣子，根本不能派任何用场。像我们这样只有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是没资格亲身参加炼钢的，可我们也要做贡献呀，于是就到处去搜集废钢铁，先是把自家用不着的废铜烂铁都交上去，然后就到各家各户去要。有些人家把铁门拆了，有些人家把铁锅捐了。铁锅都捐了吃饭怎么办？吃食堂。这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大力提倡的。我还干了一件当时自认为

很了不起的事。为了找废钢铁我们到处跑，竟然在北京站建设之前的那块荒地上发现了一些破碎的水泥块，里面裹着钢轨。于是我和几个同学用铁锤和凿子轮班敲凿，花了几个钟头，想尽一切办法，终于在天擦黑后把这根大约一米多长的钢轨弄了出来，虽然个个筋疲力尽，却是高高兴兴抬着这截钢轨送回学校去了。

“全民夺钢”的恶果很快就显露出来了，只是我们当时年纪太小不知道。最明显的恶果在农村，正值秋收放着地里成熟的粮食不管，农村的青壮劳力都跑到山上砍树当炼钢燃料。木头怎么能炼钢呢？炼钢是要用焦炭的，但是人们不懂，也不需要懂，一切都有伟大领袖在指挥，而伟大领袖是全知全能的，不可能错。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中国农村本来就缺粮，眼看到嘴的粮食又因为没及时收而大都烂在地里；粮食又是统购统销的，公粮一斤都不能少交，因为当时盛行浮夸风，向上边多报收成能得到奖赏，队干部往往争先恐后多报而不敢少报，这就加剧了后来因事实上缺粮而饿死的情况。

据说当时毛还曾郑重其事地多次问过：“粮食多了怎么办？”就在毛这样问过不久，1958年过去1959年春天一到，缺粮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没有地方能弄到粮食，于是开始有人饿死。这就是田家英奉毛之命到农村调查和彭德怀回乡探访时看到的情况，毛听过田家英的汇报，也看到了彭德怀的上书，但结果如何呢？田家英此后不久即失去毛的信任，文革初期即自杀身亡；而彭德怀则沦为“反党集团”的“祸首”，文革中被投入监牢迫害致死。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在彭德怀的诸多罪状中有一条就是所谓“勾结苏修反对毛主席”。

60年代初那几年大饥荒中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对此官方始终讳莫如深，我在一些出版物上看到的数字最高的竟达到4000余万人，即便是官方的研究者提供的数字也不少于2000万人，一般公认为3000多万人。3000多万人是一个什么概念？在60年代初，那是世界上一个中等国家全国人口的总和！有人提出质疑：怎么会有这么多？这个数字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是啊，这真的是个难题，没有官方的协助几乎不可能做到。文革后全国曾普遍撰写地方志，据说饿死人的数字是根据全国各县的县志当中那几年“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数字

推算出来的。你可以说这种推算的数字不准确，但你能够解释在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代里人口何以会大量“非正常死亡”吗？想想看，整个8年抗日战争总共死了多少人？3年的解放战争总共又死了多少人？两相对比，你就会知道3000万是一个多么骇人听闻的数字！退一万步说，即便饿死人的数字减少到3000万的十分之一，那也超过了300万！难道300万就不是个问题了吗？由此想到南京大屠杀，日本一些右翼分子在30万这个数字上大做文章，其目的在于从根本上否认大屠杀这个事实。但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想问题，为什么这么大的事情我们就没有一个稍微准确的数字？我们有那么多的政府机构，有那么多大学、研究院和那么多的研究人员，我们怎么就拿不出一份准确的研究报告和数字？无情的事实证明，不是拿不出报告和数字，而是根本不让你去做这件事；不是数字有多大出入，而是在我们这个国度里根本拿人命不当一回事！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在于死亡人数。把这些数字暂时放下，我们来看看毛泽东对此事的真实态度。

饿死几千万人的历史大灾难完全是毛的胡作非为所导致，难怪1962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要说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其实这样说已经是给毛留了很大面子。刘少奇还沉痛地对毛说：“人相食，是要上书的，你我都是要上书的！”尽管许多罪恶里也有刘的参与，但他能说出这样的话，证明刘毕竟良知未泯。

大饥荒的惨剧还没完全过去，1962年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口号。1963年、64年国民经济刚有好转，老百姓才刚刚吃几天饱饭，1965年毛泽东又提出在全国农村搞什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整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清”折腾了不过一年，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就拉开了文革的序幕，1965年底毛假林彪之手打倒了总参谋长罗瑞卿，1966年5月又打倒了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从1966年6月1日起，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腥风血雨就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整个中国不知又有多少人死于非命。

残酷的历史事实告诉善良的人们，对自己的倒行逆施毛泽东从来就没有认真反省过，对因他而死去了那么多的无辜百姓从来就没有真正忏悔过。特别具有欺骗性的是，毛所做的一切都是打着“反修防修”的堂皇旗号进行的。就说毛一心要打倒的刘少奇，他有不少头衔，什么“叛徒、内奸、工贼”，还有一个就是“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当时那个年代里，赫鲁晓夫简直就是个十恶不赦的魔鬼。而赫鲁晓夫究竟干了什么让毛如此痛恨呢？就因为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做了一个所谓“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赫在这个报告中，用大量事实揭露了斯大林杀害苏联共产党内成千上万个优秀儿女的血腥罪恶。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原来他最怕在他身后有人像赫鲁晓夫那样清算他的罪恶。庐山会议过程中，作为忠臣的田家英曾满怀忧虑地对人说：希望主席百年之后不要被人议论。事情真的不幸被田家英所言中。尽管“四人帮”被粉碎后华国锋、汪东兴等千方百计顽固坚持毛的路线，但邓小平在事实上已经把毛的那一套彻底推翻。尽管邓小平为了维护共产党的一统天下还要大讲什么“四个坚持”，其实有几个人还相信那一套？所谓共产主义不过只剩了一块空招牌，成了“一党专制”的遮羞布而已。对毛泽东历史功过的评价表面上看已由邓小平盖棺定论，所谓“功大于过三七开”，但那是对共产党而言，对于中国人民，毛则是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恶。我坚信，历史和人民终究不会永远被蒙蔽与欺骗，对毛累累罪恶的清算迟早要到来。

赫鲁晓夫后来之所以能够做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是因为他有幸躲过了斯大林一次次的大清洗，即便如此，对于当年的恐怖情景他还是心有余悸的。他在其回忆录中说：“有一天我正在利沃夫，斯大林打电话来，要我速去莫斯科。那是1949年最后几个月的事情。在去莫斯科的途中，我不知道等待着我的的是什么，可能发生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当时的情况如此。我不知道自己干什么去，也不知道我会在何种状态下回到什么地方。类似的感受布尔加宁也说过，那是一次在斯大林家中用餐之后的事情，他对我说：‘你去他家用餐时仿佛是以朋友的身份，却不知道过后是自己回家呢，还是把你带到什么地方去。’……布尔加宁代表了许多人、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所有人的想法。当时的气氛是人人自危，对于

明天都没有信心。”

根据秘密报告披露的材料，苏共“等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39名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97人被逮捕和处决（主要是在1937—1938年间），即占70%。”而“十七大有表决权 and 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因反革命罪而被捕的人大大超过一半，为1108人。”后来的复查证明，这些被残杀、被迫害者都是苏共的优秀领导干部。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和平时期，这就更让人不能理解与容忍。在夺取政权时期或战争时期，敌强我弱，阵线不清，斗争形势非常残酷，即便是这样，也不能成为为那些极端过火的清洗行动辩护的正当理由。

为何在号称建立了世界上最民主制度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赫鲁晓夫知道这是一个绝对不能回避的问题。对此，他是这样回答的：“为了弄清斯大林滥用权力、不公正地将人处死、残暴统治的根源，应当回过头来看列宁的遗嘱。列宁在口授遗嘱的时候，清楚地预见到斯大林假如留在领导层内并担任中央总书记的话，将会把党引向何方。列宁写道，应当解除他的这个职务，尽管斯大林具有一个领导者所必需的品质。然而他粗暴，会滥用权力，因此不能让他留任此职。他建议推荐一个人来代替斯大林，这个人应当更平易近人，对党内同志更关心，更宽容，不会滥用自己较高的地位。……党中央委员会没有认真听取列宁的意见，没有做出相应的结论，最终招致失败。不仅是中央委员会，还有全党都受到斯大林的惩罚，受到了他滥用权力、除掉党和非党干部的惩罚。”

一切归于个人性格、个人品质，这是赫鲁晓夫站在他的位置上所能找到的最好的答案，除此之外他还能说什么？这与其说是赫因水平所限，还不如说是因立场所限——没有人情愿从根本上否定自身。就这一点而言，毛泽东比赫看得更清楚。毛曾经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我要补充一句，即便发生了，也能够较快得到纠正，例如50年代初期发生于美国的“麦卡锡事件”就没有能够肆虐太长的时间。毛看得清楚归看得清楚，但这并没有拦住他不犯同样的错误。这说明，真正的根源很深刻，真正的根源并不在这里。更为意味深长的是，毛的那句话生前并没有公开发表，而是邓小平在1982

年谈到党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时透露出来的。邓小平也是个聪明人，制度本身出了毛病，经历过党内残酷斗争三起三落的他能看不清楚吗？他看清楚了，他说出来了，他可能也想做出改变，然而，正是他自己在说出那些明智之言的7年之后，亲手用天安门广场的枪声葬送了中国的制度革新的可能。这是个大悲剧。为什么屡屡发生这样的悲剧？看看有史以来人类所走过的血腥足迹，因为国家、民族、信仰、文化等种种藩篱已经流了多少血？远的不说，就说中东，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战争已经打了半个多世纪，至今看不到一点点和平的曙光。难道自相残杀真的是我们人类的宿命？难道我们人类的智慧真的注定冲不出“丛林法则”而只能用来自戕吗？还有我们中国人，曾经创造了人类最辉煌文化的民族，为什么历经数千年仍然摆脱不了匍匐在专制制度下苟延残喘的命运？

这就让人不能不从制度上寻找答案。

1948年，奥威尔写了一本题为《1984》的政治小说，被称为著名的“反共乌托邦”三部曲之一。书中描述的是对极权主义恶性发展的预言——人性遭到扼杀，自由遭到剥夺，思想受到钳制，生活极度贫乏、单调。特别可怕的是：人性已堕落到不分是非善恶的程度。

《1984》是奥威尔辞世前最后一部著作。在一个名曰“大洋国”的地方，全体人民处于完全监视之下，自由与思想是绝迹的珍品，屈从与无意识被训练成一种全民心态。作品刻画了人类在极权社会的生存状态，仿佛一个永不褪色的警世标签，警醒世人提防这种预想中的黑暗成为现实。

买到这本书是偶然的。我有个习惯，每次出差到一个地方，哪怕是小县城，我总要到该地的新华书店转一转。80年代中期，我忘了在什么地方的小书店里，在书架的最底层，我竟然发现了《1984》这本书，还是精装的，最让我吃惊的是，精装本总共只有400册！如此少的印数，竟然让我碰上了，我至今都感到十分幸运。董乐山翻译的并作序。正如董在序言中所说，这本书并不应该被说成“反共小说”，它的主旨是反对专制极权统治的，有些人自己对号入座罢了。

## 第六章 金发碧眼的高中女同学赵韞慧的传奇经历

1961年我从北京男二中初中毕业，考上了寄宿制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该校位于北京海淀区的黄庄，即后来大名鼎鼎的中关村的核心地带，当时那里还是大片的农地。

北大附中系北京市重点中学，也是北京基础教育示范高中，毕业生80%考上全国重点大学，近一半考入北大、清华。

北大附中是1960年北大校长陆平在原北京市104中学基础上建立的。建校初期校长由北大教务长尹企卓兼任，并从各系选调骨干教师43名直接到附中任教。北大附中是北京两所接受外国友人子女就读的学校之一，西哈努克亲王的次子纳拉迪波在此读过书，文革爆发后又成为政治风暴中心，红卫兵头头彭小蒙应该算是我的学妹。

考前填报志愿时一共6个，我填的都是可以住校的学校。为什么呢？最强烈的念头就是摆脱家庭。1957年父亲被打成右派，这件事父母一直瞒着孩子。我无从知道父母为此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只知道从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以后，原本比较和谐的家庭气氛一下子全变了：父母脾气都很暴躁，动辄吵架；孩子则经常挨骂，甚至挨打。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有办法改变大人，每次家庭风波都让我极端苦恼，渐渐地逃离这个家庭的念头便产生了。最早的一次离家出走是在我13岁上初二的时候，我跑到一个同学家里呆了一整天不回去，这种出走当然毫无成功的可能：年龄太小，毫无谋生能力，又懂得做人最基本的一些规矩，如不能偷不能骗等，加上那时的社会秩序与风气僵化归僵化，总的说来是不错的，所以最后还是只能灰溜溜地回到家里。这种事后来又发生过几次，结局都是一样。

初中要毕业了，考寄宿制高中正是我实现逃离家庭计划的机会，我考上了第一志愿，我成功了。于是我从15岁开始基本上一个人独立生活，当然生活费还要家里提供，每个月人民币15元，我差不多一个月回家一次，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拿生活费。考上一所好高中，父母当然也很高兴，我还记得父亲花了7元钱买了一支暗红色的英雄金笔送给我，7元钱

哪，这在当时是挺可观的一笔钱，差不多够一个月的饭费了。我也很珍惜这支笔，姐姐还为我织了个笔套，可惜一年多以后竟让我给弄丢了。

我这个班排序是64—1班，全班48个同学，因为获得金银质奖章而保送上来的一共14个人，占了30%。当时规定，一个学年里所有课程中最多允许两门得“良”，其他都得是“优”，操行不低于“良”可以得到“优良”奖章，连续三年得“优良”奖章才能得银质奖章，而要想得到金质奖章则操行必须都是“优”才行。我仅在初二时得过一次“优良”奖章，其他两年都没拿到，一个原因是我的体育课根本不可能拿到“优”，因为我的个子太矮了，体重太轻了：上初中时我的身高只有1.35米，体重只有25.5公斤，这样小的孩子体育课能拿到“良”就已经很不错了。另一个更要命的原因是，不知道为什么操行成绩我永远得不了“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潜在原因是，我不是那种学习特别卖力的学生，也没有家长天天在耳边督促，这使我的学习基本处于一种认真而随意的状态。我只知道学习成绩好可以得到老师、亲友的夸奖，而根本不懂学习成绩也能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事实上，正是学习成绩作为因素之一——当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帮了我，让我在那个把出身看得比天还重的年代里创造了一个奇迹：考上了大学。按规定，凡“杀、关、管”者的家属不能参军，不能上大学，不能从事机密工作，等等。这个规定也适用于“地富反坏右”，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环顾周围所有同学，我的出身是最差的。当时我还不那么满意，认为凭自己的成绩应该可以考进更好的学校——据说那年北大中文系的录取分数线与北师大中文系一样，而且已经派人来拿走了我的作文。若干年后才明白自己是大错特错，因而越发感到自己在那样一个年代里能有一个大学上比起很多人来实在是太幸运不过了。我的同班同学、班长杨良志功课很好，出身也没问题，可竟然与大学无缘，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若干年后再相聚才知道，就因为他有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台湾亲戚1963年曾到北京来看望过他的父母！我还有一个叫张明的初中同学，人非常聪明，功课很好，高中考上了清华附中，金质奖章获得者，竟然也与大学无缘。什么原因？据说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将军，随蒋介石逃到了台湾，他本

人从小跟着姥爷在北京长大。这个张明非同小可，正是本章女主人公的第一任丈夫，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充满了悲欢离合。

北大附中是男女合班。同学们来自北京不同的学校，他们在原来的学校里都是学习成绩与政治表现最好的学生，不少人不是学生干部就是共青团员，跟大家比起来，无论从哪个方面比，我都是最不起眼的。这时的我，身高虽说已经长到1.52米，但全班排队，我还是排最前边。在金银质奖章获得者当中有几个女同学，其中一个长得跟别人大不一样，金发碧眼，面色红润，个子高大。她叫赵韞慧，后来知道她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赵韞如的女儿，至于她为什么是金发碧眼，高中3年当中及其后好几年我根本就不知道，也不关心。

上了高中的我虽说已经15岁了，可对生活，对社会，对政治，都是懵懵冬冬的，什么都不懂。那个时代特别讲究“靠近组织”，“要求进步”，所谓组织就是共青团，要求进步就是争取入团。这些我根本不明白，也没人告诉我，我只是读我的书，上我的课。因为对文学有兴趣，下了课就是到处找书看。那个时候能看懂的书很有限，能看到的书也很有限，因此根本就谈不上博览群书。北大附中离海淀镇不远，也有书店，但印象中没怎么去，主要是没时间，因为下午4时下课以后按规定所有同学必须到操场上去锻炼身体，这是当时的教育部长蒋南翔的硬性规定。说实话，我到今天都感谢这个规定，正是那时的课后锻炼让我这样一个本来不太强壮的身体在日后的艰难岁月中顶过了很多磨难。

1958年上初中正赶上大跃进，1959年大跃进的恶果就开始暴露出来，1960年以后就连北京也已经日益明显感到粮食与副食品供应的紧张。其实从1955年粮食统购统销起粮食就开始定量，但副食品还算丰富，至少是北京城里人还没有感到紧张。1961年上高中，同学们都是十五、六岁的半大小子，正是长身体的当口，正如民间俗语所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一个月粮票不到30斤，肉和油只有半斤，几乎每个孩子都吃不饱。我有个同学，一顿能吃8个火烧，1斤6两，一顿就吃掉了两天的定量，没办法星期天只能裹着被子躺在床上睡觉。

怎么会弄成这样呢？当时官方的权威解释是：三年自然灾害，加上苏联修正主义背信弃义逼债。没有粮食是因为天灾粮食减产，没有肉是因为5寸厚膘的肥猪都从东北运到苏联去了。说这话的人边说边用手比划：膘不够5寸厚人家不要，得退回来。对这种说法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吃不饱也从来没有怨言，那时候恐怕绝大多数人和我一样，心甘情愿地与党同心同德，挨饿受罪，而且还非常自豪，认为这表现了中国人的骨气和革命精神。直到文革中我看到了那8本《毛泽东思想万岁》，那里面有一篇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我才知道毛泽东曾为大跃进的错误向全党鞠躬道歉，才知道刘少奇所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也是后来才又慢慢地知道了河南、安徽等省曾饿死了很多人。文革后期、特别是文革后，控制得再严也会有一些真相泄露出来，我就亲耳听到一些比较负责的干部说到，当年他们亲眼看到有不少农民就饿死在离国家粮仓不远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些农民宁肯饿死也不抢粮。说者感叹到：中国的农民真是太好了！这要搁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能的事啊！我听了这样的评论内心则是感到深深的悲哀：这话有多么熟悉啊！文革前夕学校组织我们文科学生搞大批判看电影《清宫秘史》，其中一个场景是，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后，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拉着向山西逃难，碰到一群农民跪在路上献饽饽，坐在马车上的光绪皇帝大为感动说：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啊！

说起来，我们生在北京，那已经是天大的福气了，饿归饿，总归还能吃到个七八分饱，更没听说有什么人饿死。每月20几斤粮食，还有半斤油半斤肉，还有二两糖。说起这二两糖我记得太清楚了：学校离卖糖的商店差不多一里地，也就是10来分钟的路，我每月一次去买那二两水果糖，离了商店一路走一路吃，回到学校那二两糖也就嚼完了。

主食不够吃是因为油水太少，人们就想办法增加油水，如到饭馆里去买炒菜。我们是穷学生，哪里有什么钱？但也得想点办法。冬天的一个晚上我跟着几个同学跑到海淀镇上，见很多人在一家很小的饭馆外面排队，我们也排上了，排了好一阵子才知道卖的是白菜汤，八分钱一碗，只见一个白色粗瓷大碗里盛着浅褐红色的汤，上面漂着几片白菜叶子和一些油花。我们几个同学不由分说一人抢到一碗，趁热稀哩呼噜喝了进去，一时好像真觉得肚

子里充实了不少。我们在课后还去挖过白薯。当时学校四周都是农田，也没有围墙，一座教学楼，一座宿舍楼，北面还有初中一座教学楼，再就是两个大操场——这点比城里学校好，跑步、踢球都有地方。出了楼门就是农田，可是地里的白薯早都被农民挖得干干净净，又没有工具，好不容易用手挖到几根比薯秧稍微粗一点的，送到嘴里一尝，难吃死了，根本就不是白薯的块茎。

我因为年龄小，个头小，饭量也小，自觉比起那些大点儿的同学受的苦应该也少一些。食堂里吃饭细粮很少，大米白面一个月只有几斤，主要吃粗粮，也就是玉米面蒸的窝头，北京人习惯叫“棒子面儿”，也都是库里的陈粮，吃起来粗糙不说，还有点辣蒿蒿的霉变味。其实童年时吃的大都也是这东西，十几年吃下来真的是吃伤了，以至多少年后北京流行吃“农家饭”，一时风行吃玉米面贴饼子，其实都是新玉米面做的，可我还是本能地不喜欢吃这个东西。过一阵儿忽然吃起了一种馒头，黑乎乎的，说是用加拿大进口的黑面做的，用现有的眼光看来这应该是一种健康食品，当时可是觉得怎么吃这种算不上白面的东西。蔬菜也很少，基本上就是北方最常见的土豆萝卜大白菜，大锅水煮，无肉少油，吃得人生厌。最困难的时候一人一顿饭只能分一勺儿菜，不是盛菜的大勺，而是个人吃饭用的那种小勺儿，里面不过几粒黄豆、几小块胡萝卜。

为了抵抗饥饿，人们“发明”了很多办法来欺骗自己的肚子，比如“双蒸饭”、“蛋白肉”、“小球藻”等种种名堂。

这样的日子长了，城里人开始发一种病，叫浮肿病，得病的人看上去好象胖了，但是皮肤用手一按就是一个坑儿，半天弹不起来，而且颜色发灰，全身则无力，其实就是严重的营养不良。眼看发病的人越来越多，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凡确认发病者每人发一点儿带鱼和黄豆，许多人就是靠这点儿带鱼和黄豆慢慢恢复了正常。

尽管赶上了这样的大饥荒，但就我所见凭心而论，那时的人们确实表现出了相当好的品格与精神面貌。学校里男同学粮食普遍不够吃，女同学就主动省下粮票送给那些肚量大的男同学，最难得的是，大家都认为就应该这样做，这样做就是发扬“共产主义风格”。

在我的高中阶段，中共中央开始发表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九评》。这对于我们这些中学生来说是一件影响颇大的事情。其实差不多所有中学生对政治都是一知半解的，但也正因为这样，大家对那种东西就格外好奇。《九评》中那些文章往往写得立意甚高，气魄很大，且文笔总是那样尖锐，透着咄咄逼人的霸气，每次只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广播，人民日报一发表，同学们就会在课后热烈讨论起来。但无论讨论如何热烈，总的看来，全都是官方论调的拥护者，从来就没有听到过一丁点儿不同的声音。舆论控制到如此一律的程度，今天想来，我不知道这是共产党的成功还是失败。而且我发现，《九评》的文风大大影响了文革中红卫兵的文风，如果再追追根儿，其实那正是毛泽东的文风。

学习之外，学校比较重视请一些著名社会人士来校作讲座，我记得的有几个人：一个是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侯仁之，他讲的是北京城的历史典故，能记起来的有高粱桥的来历及“高亮赶水”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他讲：为什么北京内城的西北角抹去了一只角，不是直角？原来是为了满足皇帝的要求：金銮殿上的宝座必须在北京城的正中心点上。很可能只是个民间传说，最后也要归结到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上去，但因为讲得生动，至今还有印象。一个是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胡绩伟，讲些什么，忘光了，可能因为讲的都是政治性内容，我们毕竟只是高中生，听不大明白，只记得他口音很重。一个是新华社记者郭超人，他主动要求到条件很艰苦的西藏去工作，应该算是“又红又专”的典型人物，后来当了新华社社长。还有一个就是本章主人公赵韞慧的母亲，内容留待后边再讲。

我们那届高中生是1964年毕业的，尽管那只是104中改名为北大附中以来的第二届，但升学率确实是高，应该在90%以上，除少数几个同学因一些特殊原因的影响与大学无缘外，绝大多数同学都考上了大学，最差的也在志愿之外分配到了新疆喀什维吾尔学校。在少数没能进入大学的几个同学中，最典型的要数杨良志与赵韞慧。杨是班长，团员，学习成绩相当好，特别是文科，考不上大学是不可能的。当时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若干年后有机会与杨见面才知道，他有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远房亲戚，1963年突然从台湾到他家来探亲。我相信他一定考得很好，但就因为这么一件小事，大学就不能录取他，可见

那个时代是多么荒诞。他去了一所小学教语文，文革后靠自学考试拿到了大学文凭，而且调到了北京出版社当编辑，参与了《父母必读》杂志的创办，后来一直当到编辑室主任，编辑出版了许多图书。这算结局不错的，还有不少人因此一蹶不振，一辈子作废了。

另一个就是我要说的那个金发碧眼的赵韞慧。赵是在米市大街小学上的小学，与我在男二中一个叫张明的同学是同学，这二人之间后来有一段故事。赵初中是在地处灯市口的女12中上的，就是解放前有名的贝满女中，银质奖章获得者，保送北大附中。考上高中时的我身高只有1.52米，因此在我的眼中她个子很高，大概有1米70，女同学里排第一，男女混排也排在前边。赵得银质奖章应该是硬碰硬的，无论文科理科门门功课成绩都好，包括体育。那个时候不讲究打扮，但她穿衣服总让人感到很有气质，即便一件当时俗称“毛儿兰”的上衣，也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她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全班里朗读，文中常有一些文雅的成语甚至是典故，什么俞伯牙、钟子期啦，什么高山流水、阳春白雪啦；平常聊起天来，赵口中常挂着的人物则是老舍先生啦、绣文阿姨啦，这就不能不让班里一些所谓“劳动人民出身”的同学产生距离感。一个女同学，不仅功课好，而且长得漂亮，应该是很显眼、很出众的。的确，赵自己也很明白这一点，身上那种优越感无论如何是掩饰不了的。问题是赵当时在学校里并不吃香，老师与团支部对她是另眼相待。为什么呢？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她与班里一位同我一样也姓方的同学谈起了恋爱。

这位同学叫方开胜，其父是著名的翻译家方土人先生，据说大革命时期曾加入过共产党，后来脱党，原因不详，算个民主人士吧。方开胜比我大一岁，1.76米的个子，腰背总是挺得直直的，皮肤白晰，五官端正，用现在的流行语，完全当得起“帅哥”的称呼。方人很聪明，功课也很棒，银质奖章保送上来的。方很喜欢运动，成绩也很好，特别是短跑与跳高，在全校运动会上总是名列前茅。就是这样一对年方十五、六岁的美女帅哥，竟然在60年代中期北京一所著名的中学里“大逆不道”地公然谈起了恋爱！二十年后中国的学校里兴什么“早恋”，闹得家长、学校、社会大伤脑筋，其实一件事情一旦成了风潮就算不得什么了，倒是在大讲“阶级斗争”“突出政治”的时代敢于这样做，那才真需要勇气！

我所在的64—1班是当时全校唯一的一个文科势力占上风的班，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杨、方和我三个人组成了一个文科核心。我们三个人都喜欢文科，杨是班长，方开胜是团支部委员，我是语文课代表，当时就像“三剑客”一样形影不离，课余时间经常同出同进。

应该说赵是比较早熟的，也是非常大胆的，她对方开胜表示好感常常不顾及周围人的观感。就这样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课后经常凑在一起尚嫌不够，天天见面还要互相写信、传纸条，有时就在课堂上传。尽管他们双方的学习成绩并没受到影响，但还是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

对方赵的甚密过往最先看不过眼的是一些女同学，我还记得起她们的名字，应该说这些女同学都是相当正统的，政治上是团员，学习上很努力，但成绩未必特别好。正是因为正统，她们才看不惯赵，可赵不是团员，她们拿赵没办法，只好在方身上使劲，可方却不能迅速与赵划清界线，最终发展到团支部开会，集体帮助方认识问题。我不是团员，当时也不懂得要求入团，团组织的活动也不可能让我参加，因此这些事情根本就不知道，还是将近20年后，赵以美国大使馆一秘夫人身份“衣锦还乡”到北京履任时大家见面才从赵口中听说的。眼看两人拆不散，团组织索性把情况反映到方的父母那里，让父母出面严加管教。方小名叫“毛弟”，毛弟是不大敢与父母对着干的，但他显然并不愿与赵一刀两断，公开场合两人不联系了，私下里却更密切。有几次星期日两人约好看电影，共买三张票，有我一张，方的父母问起来就说和我一块看电影了。也不能完全说是撒谎，他只是要我对他的父母证明一下确实是和我一块看了电影；而他的高级知识分子父母并不好意思直截了当问我有没有“第三者”在场，所以我其实是给他们两人的恋爱打了掩护。我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有多么重，我只是觉得他们两人好就好呗，又没妨碍别人，别人管那么多干嘛！

胆敢在中学里公然谈恋爱是直接的表面的原因，真正要命的是赵的出身。当时赵的身世没有人说得清楚，包括她自己。经过好多年，从好多人嘴里，我得到的版本大致是这样的：

赵的生母赵韞如，人民艺术剧院的女演员，解放前四十年代在国统区演话剧，受周恩来派遣与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接触。其中一位武官与赵暗接连理，1946年生下了女儿小慧，1948年，小慧被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悄悄带回中国，直到轮船已然驶到公海上时，赵的父亲才发觉女儿不在了。照这个版本说来，赵还是共产党的统战产物。

赵蕴如并不是人艺的头牌演员，为人所知的角色是在郭沫若的剧作《胆剑篇》里饰演那个在灯下缝补破被子的曹操夫人，后来有人调侃说，在郭老笔下曹操和夫人比共产党还共产党。我们上高中时，学校曾请赵韞如到学校里开了一个指导朗诵的讲座。其时赵大概有40多岁，人很瘦削，显老，妆化得很重，但是一旦张口，确实看得出台词功力来，特别是朗诵起当时风靡一时的著名诗人光未然关于支持越南南方抗美斗争的诗篇，那真是抑扬顿挫，底气十足。

1984年10月，有同学打电话来约我一同去看赵韞慧，我才知道赵已经到北京半年多了，其正式身份是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一等秘书的夫人，就住在建国门桥东北角的外交公寓里。

从1964年高中毕业分手到这次见面光阴走过了20年。不过，在这之间我与赵还曾见过两次面，一次是1969年春，一次是1975年冬。

1969年春天，我被北师大工、军宣队赶到北京西南郊房山县的东方红炼油厂劳动。当时中共“九大”刚开完，中苏两国因在中国东北黑龙江上的珍宝岛开战而关系极其紧张。我们是69届毕业生，前边三届已于1968年底都被赶到全国各地的农场去“劳动锻炼”了，剩下我们两个年级留在学校搞所谓“斗批改”，实际上无事可干。这时东方红炼油厂需要劳动力，工、军宣队就开大会动员同学报名。同学们纷纷报名，唯独我没报，我不是害怕劳动，而是因为当时我们正跟工、军宣队闹得不可开交，出于斗争需要，我不能离开学校，可是工、军宣队一定要把我撵下去。同学们去质问工、军宣队负责人：“你们动员报告不是说‘要膀大腰圆的’的吗？”回答是：“我们看他就是膀大腰圆的。”其实我个子不高，最多算中等，只有170厘米，也不壮，体重只有120多斤。

到了东方红炼油厂才知道干什么活儿，炼油厂除了建设大型炼油装置、储油大罐外，还要铺设输油管道，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抬油管子，那可真的是要“膀大腰圆”才能干的活儿。一节油管子十来米长，直径得有60公分，一节儿就得有好几百斤、甚至上千斤重，只靠几个人用绳子、杠子抬。又赶上夏天，气温高达30多度，这不干活儿还得出一身汗，何况抬这么重的油管子，那个汗出的呀，真称得上挥汗如雨。

我们这些大学生，因为不懂技术只能干一些搬搬抬抬的力气活，工人师傅主要干油管焊接的活儿。油管子抬到合适位置以后，我们手持撬杠站在一旁，根据师傅的指令调整油管的高低、角度。这时候我发现有文化的优势了：接管子需要量尺寸，按照图纸的要求，有的地方还要拐弯儿，这就需要计算了，虽说只要小学数学那点儿水平，可是对有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师傅来说就有点儿困难。有一次看他们算来算去搞不定，我自告奋勇说：“我来试试。”师傅一听挺高兴，乐得撒手。从此以后，我一直帮工人干这个活儿。我自觉干得不错，算得准确就能避免浪费，给国家节省了一些材料。

抬油管子的活儿很重，调油管子的活儿不那么重却很危险。有些油管架在平地上好办，有些油管子要经过深沟，沟里矗立着几米、十几米高的水泥支架，隔几米一个，像是一排排的龙门，粗大的油管并排卧在支架上，宛如一条条的黑色巨蛇。在油管与水泥支架之间需要放置一个厚钢板焊接的底托，油管上了支架后需要调整油管之间的距离。开始干这个活儿我不知深浅，把头钻在两根油管之间，结果前边一撬，粗大的油管子忽闪了一下，还好竟没掉下来，当时没觉得怎么样，事后真感到后怕：那么重的油管子要真的掉下来，还不把脑袋挤扁砸烂了！还有一次，油管子“空隆”一声真的掉了下来，幸亏我躲得快，往下一缩头，没砸着。事后想想也不禁一头冷汗。

我的身体从小就不强，初中时还伤过腰：半大小子不知深浅利害，有一次在家的院子里练跳远，没沙坑练什么跳远啊，结果一屁股墩在了地上把腰墩坏了，以后一辈子落下毛病。在东方红炼油厂劳动强度大不说，我又是干起活儿来不要命的主儿，既然来了就得好好干，结果腰病犯了，疼得直不起腰。就在这种情况下我都没休息过，到医务室打上封

闭止疼针回到工地接着干。当时内心的榜样就是保尔·柯察金，这是少年时就读过的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自传体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主人公，想到保尔在西伯利亚严寒的冬天筑路的情景，自己觉得难道还能比那再苦吗？

正当我在地处北京房山的东方红炼油厂劳动时，忽然接到一封信，看笔迹挺熟悉，可就是想不起是谁，因为我怎么也没想到会是高中同学来的信，想来想去都是在大学同学圈子里转。拆开一看，原来是赵韞慧，她在信中说她是从新疆回北京生孩子的。休息日我去看赵，她还住在史家胡同东头北京人艺宿舍大院。进到北京那种年头已久光线昏暗的老房子里，我看到赵躺在床上显得有些虚弱。双方5年未见互相说说各自的情况。

1964年我们高中毕业。高考之后同学们各自在家里等消息，除特别要好的之外互相之间联系就不多了，因此我只知道杨和赵没有考上，具体原因不知道。

几十年后，赵为她高考的经过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我是在国内出版的《精品阅读》杂志上看到的。文章说，北京市政府当时为出身不好的一些学生单独开了一个考场，这个情况我不记得，至少我没有被弄到另外一个考场去。赵没被录取的真实原因当时无从知晓，只是影影绰绰地觉得和她那个美国父亲有关。

文革开始后的1966年的冬天，赵专程从山西插队的地方回了趟北京，特意去北京大学找到方开胜，赵的意思是，如果方愿意，她可以同方一起去新疆。但当时方的情绪极为沮丧，赵未能如愿，只好只身去了新疆。其实方当时正有麻烦。除了父亲的历史问题外，听说是红卫兵抄方的家时发现了一张画，画上有所谓攻击毛的“反动标语”，红卫兵逼问谁干的，方家人说“家里只有毛弟会画画”，于是毛弟就跑不了了，这可能就是方当时没跟赵走的背景。多少年后赵说起此事对方还是挺失望，反复说“他不像你那么……”我明白她的意思，是说我比方扛得住事，因为她已经听我简略介绍了我在文革中的情况，知道我尽管出身不好，家里也被红卫兵抄过，但我就是有一股犟劲，死活不肯低头。这时我明白了我过去心里对方总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他有点儿少爷脾气，没想到这个少爷脾气碰到文革这样的劫难真的就有点吃不住劲了。但是各人有各人的处境，真正的原因恐怕只有当事

人自己才明白，外人不好妄议。

我一边与赵说着话，一边看着桌上玻璃板底下压着的一张照片，一男一女，女的是赵，男的看着面熟，一时想不起是谁。赵看我思索，干脆要告诉我，她一张口，我与她同时叫出来：“张明！”张明，久违了。张明是我在北京二中上初中时的同班同学，1961年初中毕业，我考上了北大附中，他考上了清华附中。张明人很聪明，成绩很好，他可能还是因为获得了金质奖章保送的清华附中。于此可见，1961年以前“阶级路线”讲得还不是那样凶，至少还没影响到他这个国民党将军的儿子。问题是赵怎么会跟张明一块合影？看出我的疑问，赵解释说，她与张明是小学同学，米市大街小学，就在金鱼胡同往南一点儿，离我家住的干面胡同也不远。原来如此：他们已经成了两口子。

赵失望之余就去找了张明。这个张明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据说他的父亲是蒋介石侍从室的少将，1949年中共建政时逃往台湾，张明是爷爷一手带大的。张明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没有被录取，按他的学习成绩考上是没有问题的，他因此很不服气，就跑到市里的招生办公室提出质问，结果被送到天堂河农场劳动教养。其实他应该明白，像他那样的出身，在那样的年代，上不了大学是很正常的事，而如果因此而不满，那无异于向党提出挑战，自己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

转眼就到了文革，赵找到了张，两个落难之人去了新疆，也许他们在那里能够多少改变一点自己的命运？在新疆的情况赵没有细说，想来应该还是过得去吧？生逢乱世，同一命运，谁也不能给谁多一点安慰。告辞出来，我只能默默祝祷大家的境况能够好一点儿。

再一次见面就到了1975年底，我与赵在大街上偶然遇到。这要说到我的营口之行。我母亲是东北营口人，她娘家农村那边还有点儿亲戚，有一个我得叫舅老爷的在营口造纸厂工作，常有到北京轻工业部出差的机会。知道我在文革中挨整不分配工作，还吊在半空中没人管，又知道我会干木匠活儿，就邀我到营口去住一阵，散散心，顺便帮他们打点家具。

说起我这点儿木匠手艺真可以说是无师自通。1974年夏天我们在北京市委门口贴大字报惹起一场大风波，李金铠老师被绑架关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对我的处理上边可能还没

最终拿定主意，我就没人管了，那是文革中一段相对宽松的时期。没事干就得找点儿事干。当时我母亲所在的小学处理废旧课桌椅，忘了为什么起了这个念头，反正也花不了几个钱，我就弄了一堆回来，又连买带借凑了几件必不可少的工具：一把锯子、一把刨子，一把凿子、一把尺子，都是最简陋的就干了起来。桌椅都是小学生用的，缺胳膊短腿，而且尺寸很小，派不上什么用场，我就把它们拆散，上边有油漆，我就用刨子一面面刮光，再把它们重新装配起来，这个过程就是我学艺的过程。这活儿从来没干过什么都不会，只能靠想象着别人怎么干的，照葫芦画瓢就是，结果一件件的都拼起来了，还蛮像那么回事，就这样无师自通了。可能有人质疑：会做小学生课桌椅就能算木匠啦？正经家具呢？其实这是外行人的想法。他不知道，椅子是最难做的，椅子背儿不是直的，前后腿宽窄还不一样，最难做；会做椅子，柜子什么的就都会做。据说过去时代木匠学徒要出师，考题就是做板凳，板凳的腿是斜的，这个能做，别的都不在话下。再说了，那个时候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不就是最简单、最一般的嘛。起步阶段很快过去，又缺木料，打不了大家具我就开始打当时刚流行的沙发，沙发椅用木料不多，底座和靠背都是包起来的，用不着好料，到破烂市上买点儿废旧弹簧，再买点儿沙发布或人造革，打成的扶手椅式沙发看上去还挺漂亮，人见人夸。于是就有人请你帮他们家打，一家接一家，白吃饭，不收工钱。为什么不能收，一是街坊邻居，不好意思；一是怕，那是什么时候儿啊，敢做私活儿挣钱？找死呢！当然也有人说怪话：还坐沙发呢，资产阶级那一套！可是过不了几天，看见好几家都坐上了沙发，说怪话的人也坐不住了，跑过来对着沙发左看右看，还要坐下来试试，趁旁边没人会悄悄地对你说：别说唉，这沙发坐上去真是挺舒服的啊，跟坐椅子还真的是不一样啊，……您看，要不然帮我也打一对儿？”说着，脸上堆满了笑容。

与赵再一次见面是在1975年冬天。说来很巧，一个寒风凛冽的上午，天很阴沉，我陪母亲老家营口来的一个亲戚到东单火车售票处买去营口的火车票，他进去买票，我则坐在金鱼胡同东口的红星电影院门口的石头台阶上等着他。等着等着，偶一抬眼只见马路对面一个熟悉的身影进了一家牛奶店。是谁呢？我疑疑惑惑地想，想不起来。我有点儿不甘心，

索性站起来走到马路对面，这时她已经出了店门向左拐了弯，我紧走几步忙跟上去，一看正是赵。双方不期而遇都很高兴，一同走到红星电影院门口，这里便道宽阔，人也少一些，方便说话。赵看上去有点憔悴，精神还好。

几年过去，我们又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从国家来说，最大的事莫过于中美关系缓和。1972年以后，我看过当时特别准予出版的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对国共内战时期美国与国共双方的关系有了大概的了解。我一直猜测赵的身世，总觉得她应该和美国有某种关系。我对赵说，你现在的日子应该好过一点儿了吧？赵点头。我犹豫着问赵：“你父亲……”没等赵回答，我下意识地说出了一个名字：谢伟思？她当即肯定地说：我的父亲就是谢伟思（但后来所有文章中都说赵的父亲叫韩恩，究竟是哪个？没有确认过——笔者注）。当时我想，世界上竟会有这样巧的事情？原来赵的父亲就是那个因为同情中国共产党而在美国臭名昭著的麦卡锡时代备受迫害的年轻的美国外交官？赵对我说，中美建交后，日子确曾好过了一些，她的母亲还接待过美国来访的客人，可是……，说到这里她的眼神又暗淡下来，我明白，这是因为刚刚开始“批邓”，中国未来究竟会去向何方，没有人能说得清。她的情况开始转坏，我则仍属待罪之身，说了一阵后互相只能默默告别，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再见。

1984年我与赵又见面了，这次见面境况可是大不相同。一个假日里我们一些同学登门拜访了赵和她的新居，那是在建国门立交桥东北角一幢米黄色的高层建筑里，客厅很大很气派。应该说，那时的中国人，别说老百姓，就是高级干部一般也住不上这样的房子。可是听说，时任外交部长的黄镇在公寓落成视察时说：还不够高档。

又是8年过去了，我们竟然劫后余生，而且能在北京重逢，真是让人唏嘘不已。很多同学已经揆违了20年，一见面自然要互相介绍这么多年各自的情况，七嘴八舌，热闹非凡。

赵的气色很好，看得出来心情不错。赵给大家介绍了她的丈夫，中国名字叫薄佐齐，一个身材高大的美国人，脸颊削瘦，眼窝深陷，颧骨很高，头顶略秃，能说中文，不是很流利。薄递过来的名片上印着薄的头衔：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什么时候换丈夫啦？我满腹狐疑，又碍于其他同学在场不方便多问。后来应赵之邀我单独或与颂平一道又去过几次，这才了解到这些年中赵的堪称传奇的经历。

赵以美国外交官夫人的身份在她宽大的客厅里接待同学，殷勤中透出几分得意。赵得意不是没有道理的，想当年她在这个国度里受过多少屈辱，在她接待的同学中就有曾对其不友好者，而现在，出生于美国、天生就是美国公民的她又回来了，真比“衣锦还乡”还风光啊！我看得很清楚，赵对某些来客其实是不欢迎的，比如那个姓高的女同学，只是给对方留了点面子，没有假以辞色。这个高也曾参加过对方开胜的帮教，高中毕业后她考上了北大物理系，成了方开胜不同系的同学。赵是把高看成情敌的，事实上赵也没看错，据说高确实追过方，只是不知为什么没有终结连理，与方在文革中的倒霉是否有关也不好问。

这次同学聚会方开胜没有来，因为他的工作单位不在北京，远在辽宁昌图县的一所中学。方与同学们恢复了联系以后也曾为调回北京做过很多努力终未能如愿。后来从不同途径断断续续听说了方的一些情况：方大学毕业后分到辽宁贫困地区昌图县劳动锻炼，后来就留在当地中学教书，又与一个女同事结了婚，生了孩子。80年代末期方终于与我有了联系，后来提出帮他调工作，颂平也真的上心，无奈警大建校初期需要人的状况已经改变，教师名额已满，最终没有办成，让人深感遗憾。又过了几年，方总算调到了北京西南的廊坊市，算是到了北京边儿上。以方的水平，在一个地方中学教语文应该说是屈才了，但方凭着自己的天分与努力也确实做到了相当的高度，成了当地中学语文界的权威，历年都要参加高考出题等社会活动。

又该回到赵的话题上了。到外交公寓参加过同学聚会后，我与赵的来往就多了起来。赵同其丈夫到过我在前门的家，吃过颂平妈妈亲手做的上海菜，赞不绝口，其中一道菜叫八宝鸭，多少年之后还会提到。

说到做饭，颂平妈妈还有其他拿手的，她身体好时每年端午节前都会包很多粽子，做好了分送给一些朋友。国家安全部凌云部长那里，都是我和颂平一道送去他家里的，他也有书法作品送给我们。

赵韞慧曾多次邀请我和颂平到她家做客。每次见到她的丈夫，话不多，声不高，总显出一副温文尔雅的绅士风度。赵非常得意地说，她在美国外交学院教过很多学生，包括她的丈夫。对赵能这么快就适应了美国的环境并出人头地，我丝毫没有感到奇怪。说起来，赵确实聪明，她中学学的是俄语，从没学过英语，可到美国没两年，英语就过了关，而且留在外交学院任教，后来许多出使中国或亚洲国家、会讲中文的外交官都是赵的学生。薄佐齐出使中国这一任的美国大使是洛德，就是那个跟随基辛格从巴基斯坦秘密访问中国，当飞机进入中国国境时，坐在飞机前排兴奋地大叫：“我第一个进入的中国”的洛德。洛德的夫人就是那个因为写了小说《喜福会》、后又拍成同名电影而驰名的美籍华人包柏漪。

赵的今天与过去，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反差未免太大，简直让人觉得恍如隔世。

赵告诉我她在1976年以后的经历。赵在新疆虽然生活于社会的最底层，但凭她的能力与智慧也没进一步倒更大的霉。新疆天高皇帝远，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号令到了那里常常已经打了很大折扣，至少没有那么大的威力了。我曾在新疆流浪过将近一年半，我了解那里的情况。自古以来，新疆就是流放犯人的地方。我发现那里有相当数量的“黑人”，所谓“黑人”就是没有户口、隐姓埋名的人，他们由于种种原因流落到这个地广人稀之所，目的往往是躲避当局的追捕或迫害。赵的父亲在美国，但赵本人抓不到什么问题，而且赵能说会写，碰到上边搞什么大批判还常常得找她写“大批判”稿。然而她生活得很不幸福，问题出在她的丈夫张明身上。赵在对我说到张的劣迹时，鄙夷已经超过了愤怒：“一个男人，连我给女儿做的小棉袄儿都能拿出去赌，你说这个男人还有救吗？”我听着赵的述说，脑海里浮出一幅幅图景，我惊异地发现，这些图景好像出自托尔斯泰的名著“复活”，而赵简直就像那个落难的玛丝洛娃。为什么会这样想我不知道，其实两个人很不一样。

赵的苦难总算是熬出了头。1978年，赵移居美国，美国总统卡特亲自接见了赵。赵争取回国的经历也有一段曲折的故事，这是二十多年以后才看到的她的自述，但她用的名字叫韩秀。自身安顿好以后赵把丈夫和女儿也办到了美国，一家人终于在美国团聚了。故事好像可以有一个比较完美的结局了，然而波折又起。赵说，张竟然背着她把自己的家人也

办到了美国，赵对此感到怒不可遏，她对张下了“最后通牒”：“让你的律师来找我谈。”我很不理解：这有什么了不起呢？然而赵断然否定我的看法，一刹那间，我明显发现我和赵的不同态度刚好反映出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差别：我是中国人，而赵是美国人。这件事成了导火线，两个人就为这个离了婚，事隔多年，赵说起此事，仍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愤怒与鄙夷。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应该说当年张在新疆的沉沦早就为两人日后的分手埋下了前因。

以张那么聪明的一个人，在命运的打击下为什么会那样自暴自弃？其实并不是没有因由可寻的。我跟张明同学时就发现，张是个非常狂妄的人，学习成绩好不假，但小小年纪，事事好发狂言，自负不加掩饰，连走起路来都仰着头鼻子朝天。张和我一样属狗，在班里年龄偏小，个子也很矮，脸形较窄，面色发黄，还生着一些雀斑。后脑勺突出，看上去前后长，即俗语所说的“南北长”，又剪了一个农村样式的偏分头，说起话来头发随着脑袋一耸一耸，就像一只好斗的公鸡。说实话，我与张的关系始终不是那么好，原因就是看不惯他的轻狂得意之态。当然，因为他父亲的原因剥夺他上大学的权利是绝无道理的，但在那样的年代里，同样遭遇者大有人在，能否保持做人的基本尊严，不随波逐流，不堕入泥淖；能否在劫难过后重新站立起来，有所作为，关键还是要看你自己的操守。仅拿他跟赵相比，不是也很说明问题吗？听说张后来同他父亲取得了联系，并移居到香港生活，继承了不小的一笔遗产，过上了寓公生活。

又过了一些日子，我同班一个成了小有名气的演员的蔡鸿祥同学找到我，说现在国际上流行文化纪录片，拍得好能卖出好价钱，你如果能弄到好题材，我可以找人来投资。他说的投资人就是张明。我想，张手里有钱想做点事情也挺好嘛。当时我刚好去宁夏出差，在宁夏首府银川认识了宁夏自治区一位姓马的副主席，满头华发，60出头，快要退休了。他是那种很有文化素养的官员，对西夏王国的历史很有研究，他向我介绍了西夏党项国的历史，还不顾年高体衰亲自带我去看了一座烽火台的遗址。我觉得这个题目既有文化内涵，又是个少有人关注的冷门，确实可以做点文章，于是对这位副主席讲了拍纪录片的想法，

他很支持，遂谈妥了协助拍摄的意向。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蔡，请他尽快与张明联系，岂料从此石沉大海，也许张对此不感兴趣，或者有什么难处，原因不明。与张的唯一一次交往也就到此为止。

这个蔡同学上初中时对电影就极感兴趣，他跟几个同学课间就看“北京晚报”上的电影广告，一放学就去看电影。他想当演员，若干年后，这个蔡果真就圆了演员梦，虽没演过什么特别有名的主角，却也给观众留下过较深的印象，特别是在一些清宫戏中演的王爷。很多演员出名靠的是脸蛋，他靠的也是脸蛋，但人家是漂亮，他是相反，脸皮粗糙，还长了很多痘痘，用同学朱柏良的话说，叫“蜜柑脸”，让人一见难忘。

说到电影，那本来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种艺术形式。当时电影票并不算贵，一场也就一角钱，我也很爱看电影，然而就是这一角钱我兜里也掏不出来，只能眼看着同学们三五成群勾肩搭背蜂拥而去。尽管如此，在看过的不多的电影中，也有留下很深印象的。有一部电影，片名我已记不得了，内容是反映二战时期欧洲某国一所学校里，有学生因为参与刺杀纳粹头子而被捕、被杀。他们的老师，一位头发灰白的老教授在讲台上，高举双手，无限悲愤地大声说：“杀死暴君，不算犯罪！”

我还有两位跟电影有缘的同学，一个叫金恒义，北京二中初中同学，一个叫徐庆东，史家胡同小学同学，两人都考进了电影学院，徐在导演系，金在摄影系。与金在文革初期见过一面，好象也是一派的头儿，此后再没来往，不知其音讯。徐的父亲是据说是中共外交部的一位司长，住东城赵家楼一处漂亮的四合院里，对这个地名印象深，还是因为历史课上学到过“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很多同学放学后常去徐家玩，那里院子大，跑得开。徐家客厅也很大，铺着厚厚的羊毛毯。我印象中最深的是他家客厅里摆放着的电动小火车玩具，在一大圈铁轨上绕着圈跑。这样高档的玩具同学们谁都没见过，应该是徐的父亲从国外带回来的。

说到童年的游戏，想起史家胡同小学的一个叫董沙雷的同学，他的父亲就是著名油画《开国大典》的作者董希文。那个时候孩子们真没什么像样的游戏可玩儿，再说课间只有

10分钟，也玩儿不了什么，于是我们就玩儿“骑马打仗”。所谓“骑马打仗”，就是一个个子高身体壮的男孩子背着一个个子矮身体轻的男孩子，跟另外一组互相揪扯，以掉不下来为胜。每次我都是跟董沙雷一组，他在下，我在上，几乎没有输过。

蔡当演员并不是科班出身，徐当导演却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的，叶剑英女儿叶向真应该是徐的师姐。文化革命中电影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为了批斗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把彭真从北京医院里劫持出来，策划上演了一幕后来蔡对我津津乐道的“七分钟闪电战”，这个组织正是以徐为头目。徐在文革后刚开放时导演了一部电影《苏醒》，之后电影作品好像不多，却拍摄了许多电视剧，可能电视剧更赚钱吧。这些作品中最著名的是长篇连续剧《重案六组》，警匪片，情节紧张节奏快，导演手法洗练，在同类作品中堪属上乘之作。让我始终不解的是，徐从不在媒体上露面，这一点跟许多影视圈中人大不一样，也许是因为徐不爱出风头吧。

扯出去这么远，该回到正题上来了。

赵在大使馆里具体担任什么职务，我有意识的没去问，但可能是在文化处，因为听她说起来与中国的很多作家、学者都有来往。她自己文笔也不错，写过不少东西，有散文、随笔等，不过我在国内当然是看不到的。她写过一本小说《折射》是在香港出版的，我在香港工作时曾在书店看到过，翻了翻没有买，现在颇有点后悔。这本小说写的正是赵在高中那段生活，包括团支部对方的帮教，涉及到的那些人物在赵的笔下当然都是一副可憎的嘴脸。后来引起点小麻烦的是，赵在小说里竟有两个人物一字不差用了真名，一个是班主任女老师应某，一个是女同学高某。班主任应老师当时大学刚毕业，教数学，个子不高，身材微胖，戴副白边眼镜，尽管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但还保持着那个时代女学生的朴素。赵不喜欢她，可能因为团支部摧残她爱情的活动的后台就是这位应老师。而高则是赵的情敌。不知道高是从什么地方知道了赵写了这么一本东西，而且认为对她多有丑化，有一天竟把电话打到我的单位，非要跟我谈谈此事，还扬言要采取什么法律手段。老同学来了我不能拒而不见，没办法，只好约她在杂志社斜对面工人体育场的铁围栏外瞎扯了两个

钟头，基本上都是听她一个人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地诉说，我就奇怪，好歹也是上过北大的一个女学生，怎么就像个没文化的祥林嫂。其时高好像已经辞了职，没有正经工作有得是时间，让人看上去实在有点儿闲得难受。见高怒火中烧，不依不饶，我认为这种女人间争风吃醋的事儿实在是太小太小了，简直提都提不起来，可又知道对高讲大道理没用，于是略施小计给高出个难题说，你就是要打官司你上哪儿找她去？其时赵已随丈夫离任回国，也许又到了某个国家继续当他们的外交官。高一听也是啊，上哪儿找她去啊？尽管依然愤愤不平，也只能徒唤奈何，找个地方出出气罢了，可我的宝贵时间就这样毫无价值的被谋杀掉了。不过通过高的嘴，我听出高还没忘了方开胜，因为高以反反复复地说方的老婆如何如何没文化而透出对方的极大同情，好像方就毁在这个本地出身的老婆手里。整个这件事在我看来根本就没多大意思，而当事人就能深切地沉浸其中不能自拔，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是多么不同啊！

赵经常邀朋友到她那儿去做客，自己俨然沙龙女主人。1984年正是中国人“出国热”开始之际，每次应邀参加赵的聚会，常会看到一些陌生的面孔，赵会对我不无厌烦地撇撇嘴说：“都是要出去的。”置身“出国热”中的我竟然好像无动于衷，对此赵感到很不解，有一次实在忍不住了，干脆直截了当问我：“你为什么不出去？”我没回答她。我内心的想法是，我出去能干什么？我有专业吗？而且英语一窍不通，难道还要从头学起吗？再说语言这东西对年龄是有要求的，我已经38岁年近不惑了，这么大岁数就算你愿意学还能过关吗？我们那一茬人，从上初中开始上外语课，绝大多数人学的都是俄语，这也是拜毛泽东“一边倒”倒向苏联的国策所赐。我大学同班一共44个学生，只有两个中学学的是英语，一个叫田明，北京男四中考来的，个子不高，白白胖胖，挺有内秀。文革后在全国总工会工作，本来仕途很顺好像已经到处级了，不幸在一次替别人出差时赶上飞机失事去世。另一个就是从上海考来的颂平。闭关锁国不要紧，一开放语言的问题就出来了，我们这茬人不是没有出去的，但吃了多少苦，付了多大代价，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我是不是在为自己的不求进取找借口？说不是借口，为什么当我对颂平说起此事，她的第一个反应竟是：你

告诉她，我想出去。颂平接着又说，你出去她肯帮忙，我出去就不一定了。后来同赵见面，我真的对赵说：我不想出去，颂平想出去。果然不出颂平所料，赵的回答是：你要出去，我一定帮忙，别人嘛，……当时我心里就感叹道：女人啊！若干年以后我不止一次想过这件事，但从来没有后悔过。我想：也许我当年咬牙走了，我的后半生肯定会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样子。什么样子？说不清楚。也许成功，也许失败，但有一个可能性是极大的，那就是家庭可能瓦解，这样的例子在那个时期是数不胜数的。

说到出国，说到外语，我倒想到了一个问题：这辈子有没有什么事是让自己后悔的？吃苦？不后悔；倒霉？不后悔；辞职？不后悔；……认真检讨起来，真的就没有一件后悔的事吗？有，那就是没有好好学外语。不过，这样的觉悟几乎是过了半百之后才有的，应该说是太晚了！

我一直认为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学外语简直就是浪费时间，一辈子都用不上！可是事实证明我错了，我太短视了！上中学时学俄语成绩还可以，90分左右，那时候年纪小，什么都不懂，让你学你就学呗。到了大学，又是阶级路线，又是反对苏修，你说学俄语对我这个永远出不了国的右派儿子有什么用？这样的抵触心理使我几乎走到想罢课的地步。有一次，俄语老师课堂提问叫起了我，我赌气地回答：“我不会！”这下子惹恼了老师，话说得不好听，大概意思是你不会怎么不以为耻反而理直气壮？没想到，忽拉拉一下子站起来十几个同学，陪我站着。我始终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猜测他们一个可能是抗议老师说话不好听，深层的原因可能也是认为学俄语没用。但是事实证明，我的眼光确实是太短浅了。有了外语，可以走遍世界。

4年任期满后，赵大概于1988年随丈夫离开了中国。第二年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北京天安门事件。1991年初颂平辞去教职去了香港，1992年10月我步颂平后尘也辞去了公职，1993年5月去了香港。

1995年的一天我接到赵的电话，原来赵到了香港，据她说是办事路过，要为她的丈夫买点香港产的好烟丝。时间很短，我和她简单聊了聊就赶紧送她走了，此后我们再没见过

面。

后来与一位负责国家安全的高级官员闲谈，说起了赵。我之所以说起赵是因为我认为像赵这样的人物早就应该在国安部的视线之内。果然不出我所料，这位官员不仅认识赵，而且说，赵当年离开中国去美国的手续就是经他的手办的，而赵的丈夫薄佐齐正是某某局某某站的头头。听到这个消息我并不感到吃惊，因为我知道，各国驻外的外交官其实差不多都是“间谍”——这句话正是我国第一任国家安全部长凌云亲口说的，用这个词并不带贬意，这在国际政治中是个公开的秘密，只是他们的活动不能触犯所在国的法律，换句话说就是要做得高明，不能让人抓到。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我与赵的交往与谈话仅仅限于老同学过往那点私人交情，而绝不涉及任何一点国家机密，否则，我就有麻烦了。

## 第七章 1964年我竟“考”上了北师大中文系

应该承认，我的运气还真的不算坏：我竟然考上了大学！为什么说“竟”？凭我的学习成绩，如果只是考试，那么即便是考最好的大学也是没有问题的，可如果你是右派的儿子，那在一个“阶级斗争天天讲”、人人都要看出身的年代就很难说了。不对，好像应该换一个说法，不是我考上了大学，而应该说是大学竟然接受了我！当时没觉得什么，事后多年过去，对那个时代了解得越多越是觉得，我能进大学，那简直就是个奇迹！在我们班40多个大学同学中，我的出身是最坏的！

录取我的大学是北京师范大学。考前报志愿，分两类学校，一类报6个，第一个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二个是人民大学新闻系，第三个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二类学校第一志愿是广播学院，就是后来名声大到如雷贯耳的中国传媒大学的前身，当时还太不起眼儿，且轮不到它呢。

高考过后要等通知，约莫一个多月过去了，好多同学陆续接到了录取通知，而我的却迟迟不来，我觉得挺奇怪，因为我平时的学习成绩很不错，特别是语文属一属二，怎么可

能连一个普通大学都进不去呢？别说，就有这样的，成绩不是一般的好，可是连一个最差的学校也没进得去，像前边说到的我的同班同学杨良志、赵韞慧。

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尽管来得很晚，但毕竟还是来了，这时候倒要庆幸是北师大录取了我，为什么？那时候老百姓都把师范大学戏称为“吃饭大学”，因为中国的老传统，读师范好，吃饭不要钱，因此旧社会里穷学生大多上的是师范。其实考学前，父亲就曾为难地对我说：考上大学也供不起。现在好了。父亲还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宁做二流的理科学生，不做一流的文科学生。只是当时的我不能理解其中的深意。反而想：我要做到理科不比你们差，文科比你们强。这是针对当时的一种说法：你们学文科是因为你们理科学不好。赌得只是一口气。因此，报志愿快结束时，有理科老师劝我改报理科，我也没有接受。

我平静地接受了现实，既不懊丧，也不兴奋。

不过这说的只是当时的心态，若干年后围绕高考了解的情况多了才知道，当年我能够上大学该是多么幸运的事情。前边讲过我一些同学的遭遇，三十多年后见到我高三的语文老师章熊，他又告诉了一些我不知道的情况。章熊老师在北京中学教育界称得上赫赫有名，多年来他不仅参加高中语文课教材编写，还参加高考作文命题及评卷。这次与章老师见面是从深圳回北京探亲的韩继东提议的，我们俩一道请章老师吃饭。章老师年近80，腿脚已经不便，我开车把章老师接到一家日本料理店。席间章老师告诉我，高考前北大中文系曾派人到北大附中来，要走了一些同学的作文，其中也有我的。据章老师说，来的老师后来指名道姓地说到了我，说这个同学有才华。当听到章老师这么说时我不禁感到诚惶诚恐：我，有才华？有什么才华？我问章老师：您说的北大那位老师怎么称呼？章老师回忆说：好像叫张树桥。我问：这位老师还在吗？章老师说：不在了。怎么回事？我着急地问，“在干校劳动，好像是拉车，车翻了，……”多么令人痛惜啊！

后来看到一些回忆录，包括北大著名教授季羨林先生写的，反映文革时北大下放到江西鲤鱼洲，不少人因为政治上的高压批斗，加上生活、劳动条件的恶劣而死于非命，还有不少人染上了血吸虫病，这种病曾被毛在其诗词中称为“瘟神”，欢呼已经被消灭了。

上了大学，住在学校里，我就像上高中时一样很少回家，所有时间都用来看书。在我看来上大学最大的好处就是有个大图书馆，可以泡在里面看书。我从小喜欢看书，上学、下学路上也要捧着本书看，不止一次撞在树上或电线杆子上。上厕所时，地上有张纸也低头盯着看半天，真像古人说的“敬惜字纸”了。说来惭愧，我父母名义上都是大学毕业的知识份子，可我家里却没有什么书。1957年以前父亲订了本《文艺学习》杂志，那就是我最早看到的文学刊物了，邓友梅后来被批判的小说《在悬崖上》就是在这本杂志上看到的。小说《三国演义》我是在小学四年级时看的，家里并没有此书，有一段时间家里来人住不下，我到亲戚家借住，刚好人家有这部书，里边许多字都不认识，我是连蒙带猜囫圇吞枣地看下来的。《水浒传》是初中时候看的，《红楼梦》名声很大，但是很难看到，大学后能看到了，翻了翻觉得“太生活化”，太琐细了，始终没有从头到尾看过一遍，就连毛泽东极力鼓吹《红楼梦》如何如何好时我也没动过好好看一看的念头，说起来还是中文系的学生，真是有点不像话。不过有意思的是，文革结束后八十年代初，我却与颂平的哥哥王志良合作写了好几篇与“红学”有关的文章。

还有其他很多中外名著我都是在上初中二年级以后看的。那时听说中苏友好协会图书馆可以给中学生办借书证，我喜出望外，马上去办了一个。以后下午一放学，我就从位于内务部街东口的北京二中出发，穿过灯市口，一直走到南河沿中苏友协去借还书。那一阵子看了不少苏联小说，现在差不多忘光了。有几本书只有书名还记得，是苏联路标派作家温·卡维林写的《船长与大尉》《一本打开的书》，路标派在当时的苏联是受批判的，但我看不出什么问题，因为年纪太小，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还无缘领略。

进了大学，读书的条件就是中学完全不可比的了，据说北师大图书馆的藏书量在大学中也是名列前茅的。有同学是从小县城里考进师大的，这在当地是了不得的大事。这些同学刚到学校时说出话来很牛：“我们县图书馆里的书都让我看光了。”可是一到北师大图书馆，看着那整个一座八层楼里一排排一人高的书架上满满当当的图书，那种狂话就再也说不出来了。但多借书却有点儿麻烦：你得在书卡柜当中一个个像中药店的小抽屉里先查

书名、书号，写在纸条上交给图书管理员，她到书库里去找，如果你要的书被人借走了，还要再去查别的书，这样一来一去往往要费很长时间。可能因为我去图书借还书特别频繁，很快就跟图书馆的老师混得很熟，熟让我享受到一点儿“特权”：别人一次只能借5本，我一次可以借10本，我每次在纸条多写一些书名，这样就大大缩短了时间，这对于我这种看书像“吃书”的人来说，也算得上一件让人快慰的事了。几十年后，看到王安忆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吞书长大，这个“吞”字用的真是太传神了，不禁让人会心一笑。

学生的生活主要是上课与考试。大学生的生活与中学生有什么不同吗？进了大学门没几天，这个差别就清楚了：中学生课时多，考试多，老师盯得紧；大学则宽松多了，一般情况下，老师上完课就走，与同学交流不多，考试也就期末考一次完事。上课年轻助教多，有的老教授一年也上不了几次课，有的可能都没见过面。像启功先生，我印象中只给我们上过一次书法课，讲“永字八法”，讲的内容已经还给老师了。

说起老教授，北师大中文系还真称得上大师云集，声名显赫。不是有说法么：“大学者，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不妨数一下师大中文系老教授：黎锦熙，著名语言学家，毛泽东的老师；黄药眠，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三十年代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1957年反右时“六教授会议”参加者，大右派；钟敬文，著名民俗学家，1957年大右派；以上3位都是一级教授，全师大一共6位一级教授，中文系占了一半；穆木天，著名作家，三十年代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与鲁迅过从甚密，1957年右派；李长之，三十年代以二十几岁后生小子身份竟敢写出《鲁迅批判》，也是右派；陆宗达，著名训诂学家，训诂学泰斗黄侃大弟子；等等……似乎不需要再一一列举了吧。

师大中文系教授队伍不可谓不壮观，不过1957年反右以后就溃不成军了。我是1964年9月入学的，从那以后，文艺界的批判运动接踵而至，特别是毛泽东1965年初有个关于“教育革命”的“春节谈话”更是“搅得周天寒彻”。老教授们一个个噤若寒蝉，校园里偶然碰到，个个都是低着头，笼着肩，哪里还有什么教授派头，倒活像是受气的小媳妇。

师大除了教授队伍名气大，领导层也有些特别人物：第一个，校党委书记程今吾，原

中央宣传部教育处长，文革中被打成中宣部“阎王殿”（毛泽东语）“大黑帮”陆定一的“黑干将”，横遭批斗，后来死得很惨。第二个，校党委副书记马建民，著名小说《青春之歌》作者杨沫的丈夫，小说中人物共产党员江华的原形。第三个，校党委副书记浦安修，彭德怀元帅的夫人，受彭牵连，被逼与彭离婚。她的二姐就是1957年“反右”时被毛亲自点名的文汇报“女干将”浦熙修。后两位历尽劫波，总算活到了“四人帮”倒台。

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春节谈话”跟师大女附中的一个女学生王正志有关，王正志后来考入北师大物理系，与我同级，文化革命中和我们一派，而且是所谓的“铁杆儿”，北师大“4.26”事件时也曾被抓到怀柔关押。因为这个原因，王毕业后分配和所有我们这派的同学一样都受到了影响，王分到辽宁省丹东市下边一所乡村中学教书，文革后与他两个哥哥一同考上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一时传为佳话。研究生毕业后王考到美国马里兰大学，其后一直在美国工作学习，据同学说，她在科研上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王在师大女附中与邓小平的二女儿邓楠同班，邓楠有一次对邓小平说起班上有一个女同学功课很好，问能不能跳级。邓向毛作了汇报，引出了毛对教改的一大篇谈话，说学生可以跳级，考试可以开卷，上课可以交头接耳……云云，要说这次谈话，毛还真是抓到了中国教育的好多弊端，然而出发点与目的有问题。

说到师大的学生，其身份同北大清华不同，北大、清华高干子女多，而师大则不多。就我所知道的，我们中文系有那么几个高干出身的女同学，一个中二（一）班的陆瑞儿，其父陆定一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文革一开始即被打倒。一个中二（三）班的钱小芸，其父钱杏邨，笔名阿英，三十年代著名左翼作家。还有一个中四女学生沈瑜丽，其祖父乃大名鼎鼎的民主人士沈钧儒先生。另一位中四的女学生闻惠，为毛所盛赞过的诗人闻一多的女儿。<sup>1</sup>

听说中四有一位男同学，文革后作了伍修权的女婿；数学系一位女同学，其父刘斐，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将军，实际上是潜伏在国民党上层的中共地下工作者。

<sup>1</sup> 闻惠的惠字，是左边一个惠，右边一个羽毛的羽。，音 hui，四声。因拼音、五笔皆无此字，只能以惠字代替。

我们中文系都上什么课呢？我记得一年级开的课有《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概论》《写作》等。讲古代汉语的是张之强老师，熟了以后知道，原来图书馆那位帮我借书的女老师就是张老师的妻子，不知给我借书行方便是否与此有关。张老师讲课很生动，我还清楚地记得，他讲《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一文时，声情并茂地朗读“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大隧之外，其乐也曳曳……”的情景。一年级期末《古代汉语》课我考了85分，好像是全班第二，尽管成绩还说得过去，其实我并不喜欢古文课，不喜欢也不要紧，藏在自己心里别说出来呀，可我有一次竟当着张老师的面直言不讳地说：“我最不喜欢的课就是古文课。”回头想想，当年年轻人的狂妄真是让人汗颜啊！好在张老师宽宏，只是笑笑并没和我计较，可能因为我成绩尚可，老师放我一马罢了。

可我为什么不喜欢古文？说不清楚，只是觉得过去的东西都是老掉牙的、陈旧的、缺乏生命力的东西，哪像现代的东西那样新鲜、那样充满活力。不知道这与多年所受教育是否有关，然而高中语文课上学习的一些散文作品肯定有很大影响。鲁迅的杂文不必说了，那是“匕首”、是“投枪”、是战斗的檄文，鼓舞人努力奋进。而杨朔的散文，如《雪浪花》《荔枝蜜》等，对新时代的讴歌也常常让人感到心潮激荡。这些散文作品因为激情澎湃且辞藻华丽，容易博得热情幼稚的年轻人的青睐与效仿。然而那种雷同的手法，如先描摹、赞美一些美好的事物，结尾时突然笔锋一转，用以代表或象征祖国或人民等宏大形象，却难免让人多少有些矫揉造作之感。

其实真正的问题还不在这里。杨朔写作与发表那些作品时正值所谓的“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时期”，这其实是一个弥天大谎。现在很多中外学者的研究已然证明，事实上大跃进那几年中国风调雨顺，是大丰收的年景。可就是在这样的好年景下，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这可是和平时期呀，是在号称“人民大救星”的毛泽东和伟大、光荣、正确的执政党领导的“德政”之下啊！这是全世界任何国家、任何朝代都不可能发生也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呀！真可以称之为空前绝后、惨绝人寰！

不过这一切我们当时并不了解，虽说也吃不饱，但毕竟因为住在北京城里，一个月还

有20多斤粮票，对外地、对农村的情况毫无所知。不知情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当局的严密封锁与欺骗宣传。

60年代初我们这个年龄段还是十几岁的中学生，种种原因决定了我们不了解历史真相。但是我想，像杨朔这样的成年人，而且在党内还有相当的地位，他们的职业、地位又可以让他们在全国各地到处跑，难道他们也什么都不知道吗？也许他们也看到了一些，或是听到了一些，然而所谓的“党性”驱使他们按照“党的需要”来发言，于是出现“睁着眼睛说瞎话”，或“昧着良心说瞎话”的现象。

所以文革结束后，特别是三年大饥荒时期饿死人的真相逐渐被揭露以后，对于六十年代那个时期“杨朔式”散文热的现象必然会出现反思与重新评价。

我常常想，时间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许多事件已然真相大白，那些当事人应该可以出来说一说当年自己真实的所见所闻所感了，不应该让历史继续笼罩在迷雾中了，然而令人极其遗憾的是，几乎没看到有什么人这样做。这个事实让人悲哀，难以言说的悲哀！

回忆这一段心情不能不沉痛：这就是我们青少年时期所获得的文学营养！文革时少得可怜的几部作品，其特点是“高大全”、“假大空”，而文革前流行的一些非常著名的作品又何尝没有这类问题？例如《青春之歌》《红岩》《林海雪原》《红旗谱》等，这些作品我都是在初中时看的，当时作品刚出版，穷学生买不起，就千方百计地到处去借，一个人只能看几天，赶紧交给下一个轮到的人。说老实话，这些作品对我们这一代青少年人生观的形成的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钦佩书中的英雄人物，渴望学习他们的榜样，为祖国、为革命而贡献自己的青春与生命。好在那时候尽管已经开始“造神”运动，但对毛的“个人崇拜”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达到登峰造极的骇人地步。然而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歌颂党而不歌颂毛，或者认为歌颂毛不够劲——竟引起了江青与毛的强烈不满，最终把这些作品统统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作品被批判，作者被迫害。最令人发指的是，还要把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学生、青年推到斗争前台，充当剿杀文明的“冲锋队”、刽子手！老舍怎么死的？田汉怎么死的？傅雷怎么死的？……多少

作家、艺术家在文革中屈死，然而我敢说，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反过共产党，反过毛泽东，没有一个！从这些惨痛而乖悖的悲剧中后人总得领悟出点儿什么，总不能够一无所得，总不能够装着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吧！

我想到了年轻的苏联诗人叶赛宁，十月革命爆发后他热情地讴歌革命，但没过多久，残酷的现实就让他陷入了痛苦与困惑中，最终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年我们知道这段历史后，总是按照官方的调子来看待与评判这件事，即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经受不了革命的考验”云云。后来还有著名阶梯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青年近卫军》作者、苏联作家协会主席法捷耶夫的自杀，等等，可能各有各的原因，但有一点不能否认，那就是“革命”本身所具有的反人道的残酷性让任何良知未泯的人无法面对。

那时候，全国上上下下已经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师大当然也不例外，搞什么“讲用”，还请了外边一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来校作报告，其中一个青年突击队队长李瑞环，号称“青年鲁班”。李虽然学历不高，但很聪明，也很会讲话，印象特别深的一句话是“费尔巴哈，眼泪八叉！”30年后，李当了全国政协主席。八十年代初，李还当过一段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上大学以后发现同学大部份是共青团员，还有几个党员。政治空气的影响，加上我也长大了几岁，自己也开始要求入团，除了经常要写“思想汇报”外，我更多的是用担任社会工作表现自己的要求进步。我先后当过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反美教育展览会的解说员，参加过系里的足球队、班里的篮球队，课余时间学雷锋给同学打开水、剃头，等等。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66年4月，团支部终于召开了有关审议我入团的支部大会，当时顺利通过，上报团委等待批准。

就在此时，震动中国与世界的大事快要发生了，这就是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即将爆发的雷声已经在人们的耳边隆隆作响了。

## 【读者来信】

## 1. 王复兴：主编纠错

欣闻贵刊刊发扬子浪先生的《北大文革三大特点》一文，此文原载《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二集，香港，时代文献出版2019年5月）第81-87页。在第85页倒数第4行有一处误植，原文：“陈伯达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对聂元梓、孙蓬一作十分严厉的批评。”此句中的“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应为：“一九六七年”。请贵刊在转载时予以更正。本书再版时也将纠错正误。

扬子浪先生在该文中对以上引用陈伯达讲话有一注释，在该文86页第1行[注2]，此注内容见文尾87页[注2]：《记忆》第143期：“陈伯达1967年6月5日讲话”。很显然，扬子浪先生引用陈伯达讲话的时间是指1967年的6月5日。他本人在[注2]中作了明确说明。笔者作为此书的主编，在编校中未能发现并改正这一差误，是我的失职，借此杂志一角向广大读者致歉。如发现别的误植，亦请不吝赐教。📧

## 2. 任富田纠错：261期的误植

由于文革时我是北京的高中女生，所以对《记忆》261期颇感兴趣。遗憾的是，这一期有几处错误和瑕疵，兹录于次，供贵刊参考。

1 P8，倒数第3、第4行，对其“造奴”经历——应是“造反”经历吧？

2 P2，倒数第7行，“第二天要在全北京市召开十万人大会”——第二天要召开全市性的十万人大会。

3 P3，第2行，“使这段痛史的得以厘清”——多了一个“的”字。

4 P6，第2行，“文革起，樊西曼被”——文革初，或文革初期。

第5行，“尤其是向曹滨海同班红卫兵领导人陈涵实灌输樊西曼所谓“黑线人物”的信息——樊希曼“是”所谓“黑线人物”的信息

5 P10，第11行，“何凤池趁机陈列了樊西曼的“黑帮，黑线”——“罗列”好些吧。

6 P20, 第9行, 在文革后期整受到纪律处分——多了一个“整”字。

7 P46, 第5行, 标题“还原与反思”座谈会后续——“还原与反思”座谈会后续

8 P51, 第6行, 季烨你好! 关于陈和曹为出身论的辩论情节你可以引用——出身论改为“对联”为好。1966年8月, 出身论尚未发表。

9 P55, 第11行, 他那种想抓上线积极革命的心态——”上层黑线“好。

10 P83, 倒数第1行, 对她文革中的突变, ; ——删去吧。

11 P94, 第14行, 从中能看出上级乃至中央宣传及文教部门的二附中文科班经验的重视——改为“对”。

### 3. 吴兴月：读樊能廷之文的几点感想

对樊的二文：地下常委；华北局；两篇。硬着头皮粗阅了一遍。为什么硬着头皮？因为二文充满派性与攻击性语句，有许多不实之词，且所论问题并非北大文革历程中的重大问题或事件。且樊所引用史料，大多是当年派性小报资料，许多史料偏颇不实，看着很费劲。

华北局一文。当时北大一部分人反李雪峰，主要背景是：1966年5月，516通知宣布彭真被打倒，李雪峰被委派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于6月1日派出全国第一支工作组进北大，工作组组长是华北局文教书记张承先。因此7月底工作组被毛批为镇压群众运动之后，北大跟着批资产路线的风，兴起一股批李的风潮，到10月北大第一次分裂，两派都揪李，批李。当时北大师生普遍认为批判李的资反路线是正确的，聂也跟着此潮流跑，没什么奇怪的，并非特别的罪行。樊说聂伸手华北局要夺权，是夸大其词渲染说聂有野心。而且是毛号召一月夺权，北大师生去华北局夺权也是响应号召而已，后来中央文革说“华北局的权不能夺。”北大师生就自然地撤了。聂介入华北局运动，可能与她妹妹聂元素在华北局工作有关，樊指出了这点，但太夸大。

北大学生去华北局揪李雪峰，批其资反路线，最突出的是历史系延安战斗队，队长

是靳枫毅。樊可能出于派性没说清楚这个战斗队的事。延安战斗队去华北局造反，不能讲是什么聂孙支配。是靳枫毅等同学主动性为主。因为他们三年级一批学生（靳枫毅等人）挨了工作组整（文中引用校文革常委刘国政话也提到此事），李雪枫女儿李丹林在历史系三年级是站在工作组一边的，且后来在7月初北大辩论工作组问题时，李丹林带领一些干部子弟公开贴大字报保工作组。工作组撤走后，延安战斗队上揪李丹林老爸李雪峰，劲头特大。此事完全可以详细述说并正面描述。但樊回避了内情。因为延安战斗队后来在北大第二次分裂时（1967年6月5日之后），延安战斗队成了井冈山有名的战斗队，队长靳枫毅成为井冈山总部勤务员之一。樊为什么不交待清楚？是为了抹黑聂元梓介入华北局运动，就掩盖了靳枫毅的派性身份，以免抹黑本派，这不是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我和靳枫毅很熟，他后来在社科院近代史所。

看樊文要很小心，因其文风特点是真真假假混在一起，有时公然造假。例如第七页讲到3月下旬有一段话，写道：“于是聂元梓又派出延安战斗队、红梅战斗队、红色清道夫、铁锤等战斗队出马，由校文革负责人亲自布置，分兵四路：一路去天津，一路去山西，一路继续住华北局，一路在北京市活动。”我本人是红梅战斗队的，一眼看出其造假，1967年3月，我们红梅战斗队整个3月呆在北大，根本没去外地，一直在学校内。且红梅战斗队在文革中从未介入华北局运动，也没贴过李雪峰的大字报。以上仅是一个例子，其他地方樊还在何处造假？不是当事人可能分辨不出。因此我对樊文的可信度，十分缺乏信心。🔒

## 2. 越人谈戴立清的回忆录

第263期登载了戴立清的回忆录，戴是当年上海文革造反的积极参与者，文革后以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及诬告陷害罪等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作为当年上海文革的亲历者，戴的回忆录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读完后个人主要有这样一些看法和感受：

1. 戴的回忆录存在不少让人遗憾的空白处，作为上海文革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戴立清的回忆录理应提供和上海文革相关的更多有价值的材料和历史细节，但戴的回忆录在自己如何走上造反道路及参与造反后上海文革运动中许多复杂事件都基本是一笔带过的状态，而且在叙述中也有非常明显的倾向性（用文革术语叫派性）。在记述文革中后期的经历时，戴讲了自己在市革委会科技组和小三线后方基地的任职工作情况，介绍了自己的不少工作业绩，也对于叶永烈书中的“不实之词”进行了反驳，但对于四人帮被粉碎前后自己的微妙表现却一字不提。

2. 该回忆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戴的回忆中提到了不少历史事件和相关细节，有些是较为可靠的，其关于王维国专案的回忆中提到林立果在上海由找人小组为他物色的女友xx，后被送去广州学医培训，这些叙述可以和广州民航局米加农的相关回忆相印证（见《昨天》138期米加农遗稿专辑）。也可证明林立果这个历史人物的多面复杂性，至少林在感情方面绝非张宁笔下描述的纯情男子形象。戴回忆中还提到林立果对于许世友的拉拢，毛前儿媳刘松林被关押的原因等等。其对王维国参与谋害毛密谋的叙述就有些捕风捉影了。

戴回忆录中叙述文革前期他参与上海造反运动、他个人在市革委会科技组和小三线后方基地的任职工作情况中也提供了不少重要的细节。其中一些叙述是否属实还需要更多的史料进行印证，比如戴回忆录中谈到后方基地74年处理联合厂问题一事，戴只提到会上宣布了对几个人的处理决定，而粉碎四人帮后的揭发材料则指戴和叶昌明在联合厂召开“万人夺权大会”，对被审查对象武装押送，说戴扬言“谁要反对就再抓几个”，制造白色恐怖云云（见李海文、王守家：《1976.10-1979.10——“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第227页）。两者所述到底何者为实，仍有待更深入细致的梳理史料并进行探讨与分析。 

【本刊声明】

##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方惜辰